

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中國科學院學術體制建立的困境

王揚宗

中國接觸西方科學雖早，然而移植近代科學組織與制度則是近百年之事。至於國家科學院的設立，則不過 80 餘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於 1928 年成立之後，對中國科學和學術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隨著評議會的建立、1948 年首屆院士選舉和相關制度的修訂，中央研究院的體制逐步改進完善，中研院作為全國學術研究的最高機關的地位得以確立。與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的中研院不同，成立於 1929 年的國立北平研究院隸屬於教育部，該院深受院長李煜瀛個人的影響，制度建設方面遠遜於中研院，雖然在 1948 年也聘任了首批學術會議會員，有意與中研院的院士選舉分庭抗禮，但由於會員非由選舉產生，難以與院士相提並論。

中國科學院是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陸的研究機構和國立北平研究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全國科學中心。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後，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的上述兩院所屬研究機構均為中國科學院所接收。至 1950 年 5 月，中國科學院整合原有公私立研究機構，成立了第一批 15 個研究所和 3 個研究所籌備處。¹ 中國

1 1949 年 4 月，北平研究院被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接管，並在 9 月北平改名為「北京」

科學院成立之後，一個引入注目的變化是沒有保留原有的院士和評議會制度，而是經過 5 至 6 年的摸索，建立了學部和學部委員制度。由於在 1994 年所有學部委員均改稱「院士」，人們往往以為「學部委員」與「院士」相同。近年來，由於與中國院士有關的學術腐敗現象引人注目，引起人們對於中國院士制度的批評；同時也有人關注先前學部委員的選聘問題，尤以胡先驕等未獲聘為學部委員的中研院首屆院士，引起不少討論，其間人們關注的是主要是政治因素的作用。²

從歷史來看，從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到中國科學院，無論是宗旨還是體制都有很大的變化，從院士、評議會制度到學部和學部委員制度的變化只是其中的一環，然而卻是極其關鍵的一環。評議會的成立，被蔡元培、朱家驊兩任院長視為中研院的「百年大計」。但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之後，為了貫徹黨的領導，評議會或類似組織卻被徹底棄置了。新建立的學部和學部委員制度是一種怎樣的制度？其作用如何？筆者以為，學部的建立及其定位以及學部的職能演變頗可代表中國科學院體制的特徵，體現中國共產黨對待和領導科學和學術事業的特點，學部委員的選任也比較集中地展現了知識份子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政權的關係。總之，以學部為核心的學術體制深刻地影響了中國

後改稱「北京研究院」，但院務仍由北平研究院臨時院務維持委員會主持，直至 1949 年 11 月 10 日被中國科學院接管。中研院在南京、上海的研究機構分別於 1949 年 5 月和 6 月被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收。1949 年 11 月後，被中國科學院接管。至 1950 年 4 月，中研院甯區、滬區的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在滬的研究所被中國科學院接管完畢。參見：王揚宗、曹效業主編，《中國科學院院屬單位簡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第一卷上冊，頁 2-3。

2 參見：謝泳，〈1949 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從院士到學部委員〉，《開放時代》，2005 年第 6 期；又收入謝泳，《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困境》（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223-245；胡宗剛，〈胡先驕落選學部委員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 年第 4 期。

科學院乃至中國科學的發展。本文擬對中國科學院建院初期建立學部和學部委員體制的過程加以考察，對學部的建立和學部委員如何選聘等相關的史實加以梳理，首先論述中國科學院的籌建與體制變化和專門委員的聘用，其次以檔案等資料為依據，論述 1954 至 1955 年首批學部委員的選聘過程，並就學部委員與中研院首屆院士選舉加以比較，分析中宣部、中科院黨組與黨員學部委員、學部委員選聘過程中的政治審查以及科學界的代際矛盾等有關問題，最後就學部和學部委員在中國科學院領導體制中的定位和角色加以討論，並就中國科學院早期體制的特點及其利弊略陳管見，以就教於讀者。

一、從院士制的廢除到各科專門委員會的成立

(一) 中國科學院的籌備

中國共產黨是很重視科學技術的。早在延安時期，即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會和自然科學院等組織和機構，從事科學知識的普及和傳授。1949 年春，當其贏得政權在即之時，即決定成立國家科學院，並決定其籌備工作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部長陸定一直接領導。中宣部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職能部門。由中宣部領導中國科學院的籌備工作，首先是要保證中共對籌備工作的直接領導，同時還要保證新建的科學院在宗旨和路線上與中共保持一致。

科學院的籌備事務由惲子強、丁瓚和錢三強進行。惲子強(1899—1963) 1924 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化學系，曾在長春吉林師範、上海中法大學等校任教，1942 年參加蘇北新四軍，1943 年到延安後，曾任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晉察冀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晉察冀化工研究

所所長，當時是華北大學工學院副院長。丁瓚（1910–1968）是心理學家，曾任協和醫學院助教、中央衛生實驗院心理衛生室主任，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理事，他也是一位老資格的中共黨員（1927年入黨，後失去聯繫），1947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心理學系進修，並到歐洲訪問，1948年歸國，並在香港重新加入中共。他在美國芝加哥、法國巴黎等地籌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分會，對留美留歐學者歸國起到重要作用。錢三強雖非共產黨員，但深受中共信任，時任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錢三強熟悉法國科研制度，頗具領導之才，浙大前校長竺可楨認為：「錢實科學院最初組織時之靈魂也」。³ 從隨後的進展看，中國科學院在體制上很少繼承中研院的經驗，相反，卻與北平研究院的作風近似。其根本原因，應在於中共視中研院為國民黨政權的附庸，必須徹底改造。

當中宣部開始籌備科學院之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則在籌備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簡稱「科代會」）。統戰部也是與意識形態工作有密切聯繫的部門，當時正在組織各界推選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而科學界為其中之一。籌組「科代會」的直接目的，乃是要推選參加新政協的科學界代表，同時還要對過去的科學工作進行檢討，討論確立新中國的科學工作方向。

1949年7月13日，科代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在會上宣布，「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成立人民自己的科學院」。這意味著不會保留中研院和平研院。此時除中研院一小部分遷往臺灣之外，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大部都保留下來。在此次會議上，以北京大學化學教授曾昭掄為召集人，由

3 《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頁600。

40位科學界知名人士組成的「新政協提案」工作組，擬訂了成立國家科學院等提案。他們提出：「設立國家科學院，統籌及領導全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事業，使與生產及教育密切配合，科學院並負責審議及獎勵全國科學創作、著作及發明。科學院為適應特種需要得設立各種研究機構，此種研究機構發展至相當階段時，為與生產取得進一步之配合得成立獨立機構」。⁴科代會籌備會全體會議批判了以往科學工作中的所謂「宗派主義」和「個人主義」與「無計畫」的自由研究傾向，號召新中國的科學工作配合工農業等建設，為即將成立的中國科學院確立了工作方向。⁵

9月中旬，錢三強、丁瓚等起草《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⁶「草案」提出：「人民科學院的基本任務在於有計劃地利用近代科學成就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組織並領導全國的科學研究，以提高我國科學研究水準」。⁷比較這個草案與「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可知，這兩個機構的宗旨是不同的，中國科學院一開始就深受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影響。9月底，新政協確認組建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最高科學機關，同時也是政務院的組成部門之一。因此，中國科學院在建院初期還擔負著領導和管理全國科學工作的行政職能。

中國科學院院長早就內定為郭沫若。郭是中共秘密黨員，當時是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分任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兼第五小組

4 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49年〉（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室，1991），頁20-21。

5 王揚宗，〈1949-1950年的科代會：共和國科學事業的開端〉，《科學文化評論》，第5卷第2期，頁8-36。

6 這個草案見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49年〉，頁20-27。

7 樊洪業，〈《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的來龍去脈〉，《中國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頁●。

組長，宣言起草委員會召集人。1949年7月13日科代會全體籌委會會議期間，他發表了「建立自然科學的精神基礎」的演講，提出要用辯證法的新科學方法，將自然科學工作的精神基礎建立起來。⁸8月，郭沫若當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隨後在9月他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是中研院院士，有較高的學術聲望，當是他被聘任為院長的重要原因。

1949年10月15日，政協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各部部長和副部長等人選，決定郭沫若為院長、李四光、陶孟和和竺可楨為副院長，嚴濟慈為辦公廳主任，丁瓚、惲子強為辦公廳副主任。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郭沫若為政務院副總理並兼中國科學院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副院長。其中，陳伯達是在政協常委會議時因為有人對陶孟和擔任副院長有意見而臨時增加的社會科學方面的副院長，⁹但他僅是掛名。除陳伯達外，正副院長均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辦公廳主任嚴濟慈也是中研院院士。可見，中宣部在物色科學院正副院長時，是很重視學術聲望的，中研院院士這一資歷，是考慮中國科學院正副院長人選的重要條件。隨後，在科學院成立專門委員會以及為各研究所物色研究人員和正副所長時，中研院院士也起到過重要作用。但中研院的院士和評議會制度，則不為中國科學院所繼承。

8 郭沫若的致詞記錄稿見《科學通訊》第2期，1949年8月16日。

9 參見〈黃宗甄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1年第4期。

(二)「科學工作委員會」胎死腹中

籌建科學院在組織方面，據說「初無成見」。¹⁰ 錢三強和丁瓚提出的人民科學院的組織機構，包括院長、副院長、評議會、院務會議、院部機關設置和各研究所等。由於郭院長身兼多職，因此必須設置擁有實權的副院長或總幹事。丁、錢方案設副院長而取消總幹事是取北平研究院的做法，行政管理工作由院務會議領導的各處（後來改爲局）擔負。《草案》保留的「評議會」，這是對中研院「評議會」的繼承。但不久，丁瓚等人決定棄「評議會」，而代之以「科學工作委員會」。1949年10月13日，他致函陸定一提出：「經過多方協商並根據前中研院原有名單，擬成科學工作委員會名單，以供參考。最近對於科學院的組織，有些意見如下：(1)副院長既有三位，不必再有總幹事。(2)評議會過去職權只限于選院長，現在應該參加計畫問題，不如改爲科學工作委員會。(3)委員名單，老解放區可以再酌量增加，但須嚴格……」

丁瓚提出的「科學院科學工作委員會委員」共85人，大致包括當時大陸的中研院院士的大部分（33人，人文除外）和部分科代會籌備委員，¹¹ 還有少數人士是院士和科代會籌委之外的學術中堅。這個名單中基本上囊括了留在大陸的中研院首屆院士和一批後起之秀。名單中來自延安和東北老解放區的人並不多，丁瓚稱「可以再酌量增加，但須嚴格」。

10月23日和29日，陳伯達、竺可楨、陶孟和、嚴濟慈和惲子

10 《竺可楨全集》第11卷頁533。

11 科代會籌備委員名單，見《人民日報》1949年7月13日「全國首次自然科學會議籌委會今開全體會」。

強等兩次會議討論。社會科學方面，由陳伯達、陶孟和審定原推薦名單，嚴濟慈負責數理，惲子強負責化工，竺可楨負責地質農林氣象等學科，丁瓚負責心理生理衛生等學科。他們在丁瓚提出的名單基礎上略加調整，包括數學、地質地理、氣象、物理、化學、心理、動物、植物、生理、醫藥衛生和工業等組，但農業、人類學因無有關研究所故決定暫缺，社會科學分為語言文字、歷史考古和社會調查三組。¹²

然而科學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名單還沒有公布就被取消。因為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中國科學院剛成立，科學家的事權不宜過重，不要搞像以前院士之類性質的組織。¹³ 1949年11月4日，中國科學院呈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的《科學院組織條例草案》中已無科學工作委員會。11月11日，中國科學院呈報政務院和文教委員會的「中國科學院最近情況簡報」中關於科學院編制的說明中說：「另設各種專門委員會，目下任務為改組各研究所及訂定各所研究方針」。¹⁴

中國科學院成立之後，雖任用中研院院士出任副院長等要職，但黨並沒有以任何形式承認原有院士，故院士制實已廢除；而評議會在建院之前即遭取消，取代評議會的科學工作委員會也沒有建立起來。因此，中科院的體制與中研院的體制差異很大，最大的差別在於中國科學院建立了一套黨的組織，其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科學院黨組（以下簡稱院黨組或黨組），黨組高居一切之上，專家學者處於次要的地位。中科院黨組成立於1949年11月_A，是中共集體領導

12 名單見《竺可楨全集》第11卷，頁553，557–558。

13 宋振能，〈中國科學院建立專門委員會制度的回顧〉，《中國科技史料》1991年第4期，頁38–52。

14 「建立中國科學院有關檔材料——中國科學院最近情況彙報」，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的核心，由惲子強為書記，丁瓚為副書記，¹⁵ 黨組成員有李亞農、吳征鎰、汪志華等。郭沫若院長是深受中共最高層信任的中共秘密黨員，他擔任主任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是中國科學院的直接領導機關，但他擔任職務頗多，院內事務多由院黨組負責。當時中國科學院京區各研究所很少黨員，院部也只有七、八名黨員，大都在黨組之內，丁瓚以能力較強故實際負責事務較惲子強更多。他們的學術資歷都不深，實際權力卻在竺可楨等副院長之上。吳征鎰回憶說：「黨組管理一切……所有的工作都是由這七、八個黨員研究決定。研究一定的方案就到郭老家裏向郭老彙報，黨內向胡喬木彙報。」¹⁶

(三) 「各種學科專門委員」的聘任

為了配合中國科學院的組建，從 1949 年底至 1950 年，中國科學院計畫局先後進行了全國自然科學專家調查、自然科學工作者調查、該院專家調查和科研機構調查。其中以自然科學專家調查尤為重要，中國科學院從中遴選了各研究所的所長副所長等負責人選和科研骨幹，並以此為基礎成立各學科專門委員會作為學術顧問。

自然科學專家調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單為基礎，經過選擇和補充，確定姜立夫、許寶騫、蘇步青、陳建功、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饒毓泰、嚴濟慈、曾昭掄、侯德榜、吳學周、莊長恭、王家楫、陳楨、伍獻文、童第周、貝時璋、秉志、羅宗洛、錢崇澍、胡先驥、張景鉞、戴芳瀾、竺可楨、趙九章、塗長望、謝家榮、楊鐘健等共 35 人（共收回 31 張有效投票）為徵詢對象，

15 過去一般認為陳伯達為中國科學院首任黨組書記，據樊洪業先生考證有誤。

16 《吳征鎰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2 年第 3 期；吳征鎰，《九十自述》，《百兼雜感隨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41、275-276。

請他們推薦本領域有科學成就的專家，共得 233 人；第二階段的調查對象為前一次被推薦的專家，再請他們推薦本專業專家。調查起自 1949 年 12 月 12 日，至次年 4 月 15 日結束。兩次調查共得 865 位專家，涵蓋數學、近代物理、應用物理、物理化學、有機化學、生理學、實驗生物學、水生生物學、植物分類學、心理學、地球物理學、地質學、地理學、天文學等 14 個學科。其中既有卓有成就的名家碩學，也有剛剛嶄露頭角的後起之秀（包括楊振寧、李政道等）。865 人中當時還有 174 人滯留國外，其中一些人後來回到了國內。兩次調查的結果最終彙編為《專家調查綜合報告》。¹⁷ 1950 年春，中國科學院組織各專門學會召開了八次座談會，為調整和成立各研究所做準備。

1950 年 3 月 16 日、4 月 27 日和 5 月 2、11 日，由中國科學院院長、副院長和辦公廳、計畫局等機關負責人參加的院辦公會議，討論和確定了專門委員會的性質、職權和專門委員的名額和產生辦法、待遇等，以上述調查為基礎，選定自然科學各科人選 160 餘人，分為數學、近代物理、應用物理、物理化學、有機化學、生理生化、實驗生物、水生生物、植物分類、心理、地球物理、地質、古生物、地理、天文 15 組。¹⁸ 分組名稱，與科學院當時正在籌備的研究機構的名稱一一對應。可知，專門委員之職責相當專門，大體限定於研究所的層面，與最初設想的科學工作委員會有較大差別。

17 這一調查的結果已發表於《中國科技史料》第 25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228-249，《中國科學院 1949-1950 年全國自然科學專家調查綜合報告》。

18 除古生物稍後確定，地理組稍後增補 5 人之外，其他各組名單大都在 1950 年 5 月 2 日確定，見竺可楨日日記，《竺可楨全集》第 12 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頁 87。

關於專門委員的產生辦法，會議通過並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備案的《中國科學院各種學科專門委員聘任暫行辦法》¹⁹規定：「各專門委員主要由本院征請國內成績卓著的各種學科的專家提名，由院長聘任之；其未被提名而確有成績表現者，亦得遴選聘任。」從委員名單來看，絕大多數自然科學方面的專門委員都是通過上述調查投票產生的。比較《專家調查綜合報告》中各組排名與以上 15 組專門委員會名單，²⁰可知各組專門委員都是 1949–1950 年專家調查中的得票領先者（尚在海外未歸者除外），只有極少例外者，即那些已經在科學院擔任一定職務的黨員科學家，如惲子強、陳康白、吳征鎰等。他們或根本不在專家調查報告的推薦者之列，或排名靠後，惟因工作關係，被聘為專門委員。這一做法，為後來在學部委員選聘時仿效。

社會科學和工程方面的專門委員則比自然科學專門委員晚一些。1950 年 6 月 20 日至 26 日中國科學院第一次院務擴大會議之前，自然科學專門委員名單已公布並獲邀參加這一會議。會議期間，工程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機構才提議進行工學、語言、考古等組專門委員的提名和選舉，近代史研究所提出聘請吳玉章、胡喬木、華崗、翦伯贊、邵循正、何干之、田家英、胡繩、葉蠖生、金燦然及少數民族史專家為近代史方面的專門委員，社會科學所提出了該所專門委員。會後即由有關各所提名和商討，經院長確認，到 1950 年選定 61 名為社會科學方面的專門委員，分為近代史、歷史考古、語言文字和社會經濟四組。社會科學各組委員聘任時，馬列主義一派的「進步學者」或黨政官員各組都有，尤以近代史組為甚，幾乎清一色（即前引名單

19 《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印，1950 年 12 月），第 1 集，頁 6。

20 《中國科學院資料彙編》第 1 集，頁 7–10。

加範文瀾、白壽彝、劉大年）。但歷史考古組還保留了向達、金岳霖、馬衡、陳寅恪、陳垣、湯用彤、馮友蘭、鄧之誠等「資產階級」學者，他們占該組的一半以上，社會經濟組尚有陳達、張奚若、費孝通、錢端昇等人，語言文字組也以專家為主，表明除近代史組外，此時從前著名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大都還沒有遭到排斥，但主事者的意識形態偏向已很顯明。

工學實驗組專門委員 10 人，是由工學實驗館選定的。此外，1950 年 10 月還增補了自然科學各組專門委員 18 人。統計 1950 年選聘的專門委員為 255 人，其中有兼兩組者 14 人，實際專門委員人數為 241 人，其中，自然科學和工程各組為 182 人（院外 126 人，院內 56 人），社會科學方面 59 人（院外 47 人，院內 12 人）。此後，1951 年增補 2 名專門委員，1952 年增補 1 人，1953 年增補 8 人。總計 1950 年至 1953 年共聘任專門委員 252 人，分為 20 個組，其中科學技術專家 192 人（院外 136 人，院內 56 人），社會科學方面 60 人（其中院外 49 人，院內 12 人）。²¹

按照《中國科學院各種學科專門委員聘任暫行辦法》，「專門委員具有中國科學院學術顧問的性質，依照學科的性質，可分為若干組，得被商請研討下列各事項：(一)中國科學院各研究部門的工作計畫、執行經過及其工作報告；(二)中國科學院各研究部門的高級研究及技術人員的聘任和升級；(三)中國科學院與院外研究工作的合作；(四)中國科學院對院外的各種學術補助；(五)科學發現發明和著作的審核；(六)國際學術合作的策進」，「中國科學院進行上列學術商討時，得依其性質，隨

21 參見前引宋振能文。此文收錄《宋振能文集》（中國科學院院史資料與研究叢刊，2006）時，名單曾重新核定，稍有改動。

時向個別專門委員徵求意見，或召開某一組專門委員會議或幾組專門委員的聯席會議」。但這些職責，很難落實。如從 1950 年各專門委員聘任，至 1955 年學部成立、專門委員會結束，其間不僅沒有開過專門委員全體會議，甚至連各科專門委員分組會議也沒有舉行過一次。²² 所以專門委員雖然具有顧問性質，但實際上各專門委員會徒有虛名，僅在以個人名義參加院務會議時發表意見，或當院方就某具體問題徵詢意見時，專門委員能夠發表意見，起到一些「顧問」作用。1953 年，當中國科學院黨組力量加強，並決定學習蘇聯科學院建立學部之後，專門委員會的作用也就名存實亡了。

二、學部的籌備和學部委員的選聘過程

(一) 籌備學部的背景

中國科學院雖以中研院、平研院為基礎建立，但從一開始就計畫學習吸收蘇聯經驗。籌備伊始，1949 年 5 月，丁瓚參加中共代表團參加布拉格世界和平大會途徑蘇聯就訪問蘇聯科學院，受到蘇聯科學院院長瓦維洛夫院士的接待。回國後丁瓚向國內介紹蘇聯科學院的組織結構、蘇聯科學的計劃性以及蘇聯科學院內「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但他對蘇聯科學院學部和院士的作用似不甚了了，在他的《蘇聯的科學院》一文中都沒有提及。²³ 丁瓚出訪蘇聯為時甚短，回國後宣傳蘇聯科學成就，介紹蘇聯米丘林生物學等，曾遭到其師胡先

22 參見前引宋振能文。

23 丁瓚，〈蘇聯的科學院〉，《科學通訊》第 1 期，頁 16，1949 年 7 月。胡先驥對丁瓚的批評。

驢的批評。²⁴

蘇聯科學院是蘇聯的最高科學機關。院士制度是其核心之一，以全體院士組成的院士大會為該院的最高決策機構，由院士大會選舉產生蘇聯科學院院長和主席團（由院長、副院長、主席團學術秘書長、各學部院士秘書和主席團委員組成）。主席團下設學術秘書處，是院長、副院長的助手，受主席團委託負責全院性的科學組織工作，「掌管幹部挑選工作」。²⁵ 學部主任、學部常委會通過所長領導各研究所的科學活動，「並確定科學的發展方向、發展遠景和重大科學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以及各研究所的工作內容和並和研究所所站交換意見，考慮最近十五年內要做些什麼工作，包括理論問題和國民經濟上的重要問題」。²⁶ 蘇聯科學院有 8 個學部，學部由相應學科的院士組成，分學科對各研究所實行學術領導。蘇聯黨對科學院的領導是通過安排黨員科學家擔任秘書長等職實現的，但在蘇聯科學院的黨組織不屬於科學院內組織，而屬所在區委領導，因此其作用有限。²⁷

中國科學院則不同，院黨組是科學院的最高決策機關。建院最初幾年，科學院黨員不多，黨組領導的資歷也很淺。1950 年 5 月以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為基礎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不久，該所的黨員範文

24 胡宗剛《胡先驢先生年譜長編》頁 537。此書誤將此事係於 1950 年。

25 主席團學術秘書處由一名學術秘書長和幾名學術秘書組成。1955 年該處取消，改為任命一位學術秘書長和三名副秘書長。參見《蘇聯科學院有關資料彙編》（中國科學院秘書處編印，1955），頁 117、280。

26 〈柯夫達顧問對有關學部及秘書處的工作的報告〉，《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 年》（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編印，1956），頁 98–99。

27 關於蘇聯科學院的體制和組織系統，可參見：Alexander Vucinich,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1–41.

瀾、劉大年加入黨組，黨組力量有所加強。²⁸ 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後，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宣部爲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科學院的領導，於1953年1月14日，任命原中共西北局常委、宣傳部長、西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張稼夫出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兼任副院長。張稼夫於1927年加入共產黨，1929–1932年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這段經歷可能是他到科學院任職的原因之一。從此張稼夫成爲中國科學院的主要領導人，直至1956年3月初由張勁夫接替。

張稼夫到院不久，即率領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代表團由19個學科的26位學者組成，以錢三強爲團長。張稼夫以歷史學家的名義參加代表團，爲代表團的臨時黨組織書記，是代表團的實際最高領導者。訪蘇代表團一行於2月24日離開北京前往蘇聯，3月5日到達莫斯科，進行爲期近3個月的訪問。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瞭解、學習蘇聯如何組織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以及蘇聯科學發展的經驗，瞭解蘇聯科學發展的狀況。²⁹ 5月24日，訪蘇代表團返回長春。訪問成果匯由中國科學院秘書處編輯爲《學習蘇聯先進科學——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匯刊》一書，於1954年7月出版發行。

1953年是中國科學院發展的一個轉捩點。隨著朝鮮戰爭停戰，國家基礎日趨穩固，建設加速，中國科學院爲此也採取了種種措施，擴充研究機構，加強研究力量，爲國家建設服務。該年科學院的研究機構從建院初期的不足20個發展到36個，職工總數從1950年的約

28 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頁32。

29 〈中國科學院關於訪蘇代表團工作的報告〉（《學習蘇聯先進科學——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報告匯刊》（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頁1。

1000 人，迅速擴張到 7200 多人，³⁰ 其中研究員、副研究員等高級研究人員 347 人。³¹ 爲了適應新形勢，落實爲國家服務的辦院路線，院黨組於 1953 年 11 月 19 日向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呈送《關於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的報告》，在分析了中國科學院的現狀之後，提出當前的重點工作爲：(1)組織力量支援國家工業建設，首先是重工業建設。(2)有重點地對擬建設的工業中心或經濟區域進行自然條件和資源的調查研究。(3)相應地發展基礎科學，使之成爲不斷支援國家建設和不斷提高科學水準的有力保證。(4)對於在生產上或學術上迫切需要，而目前十分薄弱或根本缺乏的學科，要立即充實與建立等。

報告認爲，目前中國科學院的體制還存在很嚴重的問題，即學術領導力量薄弱，因此提出參照蘇聯科學院的辦法，分學部領導各所的工作。報告指出：

現時科學院的領導機構是在院務常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正副局長和正副辦公廳主任組成）下，由幾位副院長分工領導各研究單位的工作，而實際主管研究業務的是計畫局，主管書刊出版的是編譯局，主管行政事務的是辦公廳。科學院所屬各研究單位散處各地，除了召開會議與頒發公文之外，缺乏經常的業務領導與思想領導，實際處於自流狀態。計畫局除少數處長對科學情況比較熟悉並有相當的學術水準外，多數是才出大

30 中國科學院計畫局編，《中國科學院四十年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北京：1989），頁 1、8。

31 《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5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 169。

學不久的青年幹部，實際上不能成為院務會議在學術領導方面的有力助手，於是造成上下脫節、工作忙亂、行政領導多、學術領導少的嚴重情況。各所又都缺乏領導骨幹，政治及思想情況無法掌握，工作亦無法貫徹下去；而各所所長又多忙於行政事務，有的幾乎等於全部脫離研究業務。因此，現時科學院的組織機構必須適當調整，領導骨幹必須適當加強，領導方法必須徹底改變……。參照蘇聯科學工作的先進經驗，科學院應分學部領導各所工作，並把院部、學部以及所的學術領導機構建立與充實起來。通過一定的民主方式，把科學家中的進步分子適當推選到各級學術領導機構中去，黨主要就應該依靠並通過他們去進行工作。

這就是建立學部和選聘學部委員的由來。同時，該報告也提出了改進和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科學院工作的領導的辦法，即：「爭取首先在每一個重點所中，都能配備一個較強的黨員幹部去擔任行政副所長，並使之經常取得各該所所在地黨委的直接領導，把分散在各地的科學機構都很好地領導起來，通過各所的進步科學家把全體科學家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總路線和總任務而共同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黨對科學院工作的全面的深入的領導。」³²

《報告》提出成立學術秘書處和物理學數學化學部、技術科學、生物學地學部和社會科學部四個學部，並在各研究所設立學術委員會，以加強對學術工作的領導。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科學院的報告，並將該報告與中共中央的批示一起在黨內轉發。可

3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頁175-176。

見，建立學部，在全國範圍內聘任學部委員，就是要凝聚了全國的各學科優秀學者，參與科學院的學術規劃和組織、管理，使科學院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科學中心。學部的成立以及學部委員的聘任，不但是借鑒蘇聯科學院的學術領導經驗，也是隨著科學院的發展而採取的加強「學術領導」的舉措。「學術領導」是中國科學院早期歷史上的常用提法。這是由於中國科學院實行中共黨組為最高領導的體制，而院內各級黨的領導人很少專家學者，在學術上沒有權威，因此必須吸收專家學者參加學術工作的組織、計畫和管理等事務，謂之「學術領導」。但由於遵循「理論聯繫實際」的基本路線，強調研究為國家和人民服務，以及重視學術上的思想檢查和批判，學術的組織和管理並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使黨政官員具有很大的發言權乃至決策權，專家學者的「學術領導」權也沒有體制上的保障，難以落實。黨的領導與專家學者的學術領導的衝突和協調，構成了中國科學院體制上的一個基本問題。

(二) 學術秘書處的成立、學部的籌建和學部委員的推薦提名

1953年至1954年初，中國科學院開始著手在院務會議下成立學術秘書處和建立學部。1954年1月30日，院務常務會議通過了學術秘書處和學部組織及政府秘書長、秘書、學部主任、副主任名單。³³4月8日，學術秘書處正式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學部籌委主任會議。³⁴

³³ 《竺可楨全集》第13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頁375。

³⁴ 《竺可楨全集》第13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頁412。遲至1955年6月3日，中國科學院才發文通知成立學術秘書處和四個學部籌委會，同時撤銷了計畫局。

學術秘書處是院務會議在學術領導方面的有力助手，具有重要的學術職權，包括：研究與綜合各單位研究工作計畫；瞭解院內外各部門研究工作情況與存在問題，對各單位所提出的重要問題進行分析和綜合研究；科研工作方面的各項組織與聯繫工作；對全院性學術活動進行組織與聯繫工作；負責管理《科學通報》的編輯事宜等。³⁵ 學術秘書處秘書長為錢三強、陳康白，副秘書長為秦力生、武衡，秘書有貝時璋、葉渚沛、錢偉長、張文佑、劉大年、張青蓮、葉篤正、汪志華。這個名單包括錢三強等年富力強的著名專家，以及武衡、秦力生、汪志華等行政幹員。秘書處下設四個專業組和一個綜合組，分別聯繫和統籌各學部籌委會事務。四個學部的規格非常高，院長副院長郭沫若、竺可楨、吳有訓和東北分院院長嚴濟慈分別出任社會科學、生物學地學、物理學數學化學和技術科學四個學部主任，莊長恭、華羅庚、許傑、陳鳳桐、茅以昇、張稼夫等一流科學家和在科學界擔任要職的人士分別出任各學部副主任，從而保證學部的權威性。

學部仿蘇聯科學院建立，但蘇聯科學院各學部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由各學部院士、通訊院士組成的學部會議，學部會議選舉產生的學部常委會是其執行機構，由學部院士秘書、副院士秘書和學部常委等領導。如果採用蘇聯科學院的學部體制，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建，首要的工作是推選院士。在是否建立院士制度上當時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建立，但時機不成熟，應暫緩幾年，一是建立過渡性的學部委員制。這兩種意見其實差不多，都認為建立院士制度時機不到，需要一個過渡期。學部委員是吸取蘇聯科學院的經驗並結合中國科學院當時狀況而採取的一種過渡辦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一條基本信

35 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頁 42-43。

條即中共的領導是一切工作成功的法寶。中國科學院正在加強黨的領導，若以院士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則置院黨組於何地？「學部委員」的名稱，據說是院黨組與專家們商討的結果，經過中宣部批准的。³⁶張稼夫認為，學部只是一個工作機構，學部委員也只是一種工作稱號而不是榮譽稱號。³⁷因此，學部委員的推選，沒有採用蘇聯科學院院士自主選舉的辦法，而是借鑒了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會聘任的辦法，「通過一定的民主方式，把科學家中的進步分子適當推選到各級學術領導機構中去」，³⁸即以專家推薦投票為基礎，從中遴選學部委員。

學部籌備的具體工作即由學術秘書處和各學部開展，相應分為四組。各學部的推選工作由各學部組織實施，並由錢三強秘書長負責，黨組書記張稼夫全面領導學部委員的遴選工作。學部委員名單的確定，經過了中國科學院黨組會議、院務常務會議的反覆討論。

4月，各學部召開會議，研究了各學部的學部委員的選擇標準、名額分配和學科劃分、徵詢物件的範圍等問題。5月7日下午，秘書長錢三強召集錢偉長、葉篤正、張克明、張文佑、鄧稼先、貝時璋、嚴濟慈、汪志華、劉桂五等人聽取各組彙報。關於學部委員的入選資格，各學部籌委會會議研究都提出三條：重要學術成就、在推動中國科學事業方面的貢獻以及忠於人民的事業，且首先要考慮學術成就，但各學部掌握的標準略有不同。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學部的標準都差不多，惟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對解放區來的備

36 貝時璋，《關於籌建學部的回憶》，劉大年，《學部的籌建及其歷史作用》，均見《院史資料與研究》1991年第6期。

37 李真真等，〈張稼夫同志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1年第6期。

3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頁175。

選者著重考慮第二條，技術科學部提出強調第三點忠於人民事業，是「希望（獲聘的委員）能掌握政策且能保密」。這次會議擬定各學部委員的名額如次：數理化，30—40人，生物地學 55—65人（其中，生物 35—40，地學 20—25），技術科學 40—50人，社會科學 40—45人，總數為 165 至 200 人之間，而設想的提名數為各組名額的兩倍。這次會議提出，各學部最初名單原則上由學部主任等會議決定，然後提交少數人徵詢意見。會後，各組召集有關專家，對學部的任務、性質以及學部委員的推選等問題進一步徵詢本學科知名專家的意見。5月11日，郭沫若、張稼夫、李四光、竺可楨等出席學部座談會，就學部委員的上述標準達成了一致意見；關於名額，郭院長主張「寧缺毋濫」，得到與會者一致同意。³⁹ 5月28日，錢三強再次召集學術秘書處會議，研究學部籌備工作，會議在聽取各組反映的專家意見後，決定：1、技術科學部委員的推選要進一步醞釀，徵求各學會和各有關部門的意見；2、生物學地學部與物理學數學化學部聯合討論；3、社會科學部委員的推選，單獨考慮。後來，社會科學方面委員的推選，就更多地得到了中宣部的參預和指導。6月19日，秘書處會議決定分為地學、動植物學、醫學和基礎醫學、農林、礦冶、化學及化工、土木建築（包括大地測量）及水利、機械、電機、數學及力學、物理學共 11 組學科分別推薦學部委員人選。⁴⁰

7月初，以院長郭沫若的名義向全國自然科學家發出 645 封信，徵詢對象包括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全國科聯常委、各學會理事、大學副教授以上從事過研究的專家、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產業部門的

39 《竺可楨全集》第 13 卷，頁 429。

40 以上關於學術秘書處的工作，均據 1954 年學術秘書處會議紀要或記錄，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高級科技人員等，請他們推薦各學部委員人選。至當年 11 月底，共收回 527 封回復，共有 665 人被推薦為學部委員⁴¹。這樣就基本上完成了除社會科學部之外的學部委員提名。1947-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選舉過程中，主要是由全國大學院校、「具有相當成績之專門學會和研究機構」提名，除人文組外，院士候選人初選名單共有 347 人。⁴¹ 與八年前的院士提名相比，學部委員的提名人數擴大了 300 多人。雖由於學術成就要求有所降低使人選擴大，但個人提名較之機構提名更有自由度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推選學部委員的原則標準主要是學術水準成就以及政治兩個方面，而重在前者。推選之初，郭沫若院長就提出：遴選學部委員原則是「寧缺勿濫，寧少勿多」，得到了院內上層領導的一致贊同。⁴² 根據返回的推薦得票情況，學術秘書處提出各學部學術水準要平衡，人數不要平衡，技術科學部委員可以少些。具體的辦法是：「在推薦比較集中的各學科中，原則上是以得推薦票數超過總推薦數的四分之一者為入選標準，同時還注意到以下幾點：(1)如該學科的業務比較發展，人才也比較多，這方面的委員就多選些；對於那些業務水準較低，沒有適當人選，而又是必須發展的學科，就挑選本門學科中比較好的參加學部；(2)加入少數做科學組織工作的黨員幹部；(3)對於在政治上有重大嫌疑而為科學界所普遍不滿者，雖然在學術上有成就，也不列入。」⁴³

41 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提名探析〉，《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29 卷第 4 期（2008），頁 331-334。

42 參見《竺可楨全集》第 13 卷，頁 429；1954 年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會議紀要。

43 《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學部委員的推選經過和學部委員名單的報告》，1954 年 11 月 22 日報告及其修改稿，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1954年8月11日，竺可楨、張文佑、簡焯坡、張克明商定生物學地學部學部委員初步人選名單，計生物學29人，地學18人，共47人。與此同時，物理學數學化學部也確定了34人的名單(數學8、物理12、化學14人)。⁴⁴8月13日，竺可楨、吳有訓、錢三強研究學部委員人選，初步擬出了數學組7人，物理組11人，化學12人，動物學9人，植物學8人，醫學7人，農學6人，地質學16人，地球物理4人。⁴⁵1954年9月，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部地學部根據推薦結果，分別擬出學部委員人選名單29、42人。

從現存的資料看，數學力學天文學組發出信52封，收回45封，華羅庚、蘇步青、陳建功、周培源、許寶騷、錢偉長、江澤涵等獲得較多推薦票居多，均列入學部委員人選；物理學組發信65封，收回50封，錢三強、趙忠堯、彭桓武、王淦昌、吳有訓、葉企孫、王竹溪、嚴濟慈、饒毓泰、餘瑞璜、葛庭燧、施汝爲等依次居於前列而入選。⁴⁶化學組發信54封，收回46封，莊長恭、黃子卿、吳學周、曾昭掄、傅鷹、張青蓮、趙承嘏、楊石先、唐敖慶、盧嘉錫獲得較多推薦領先而入選，汪猷雖獲得票不多，也被列入名單。科學院黨組解釋，汪猷在抗生素工作，尤其是橘黴素的立體化學結構方面的工作，得到莊長恭的極力推薦而列入，黃鳴龍雖獲得推薦較多但因政治上有

44 據竺可楨當日日記，見《竺可楨全集》第13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頁496-497。

45 據竺可楨當日日記記錄名單和資料，竺所列尚有不確定的人選，的確是「初步決定」。見《竺可楨全集》第13卷，頁498。竺可楨日記所載名單與下文引用檔案所載基本相符，但略有不同，竺所列多出了惲子強、吳征鎰等黨員學部委員人選和少數得票較少，尚在考慮之列的委員人選。

46 嚴濟慈因擬出任技術科學部主任，故未列入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名單，而列在技術科學部名單中。

疑點而沒有列入。

生物學地學方面，動物組發信 37 封，收回 31 封，秉志、貝時璋、朱洗、陳楨、伍獻文、童第周、王家楫、劉崇樂、劉承釗被列入名單，但獲得較多推薦票的胡經甫、陳世驥未列入名單中。植物組發信 41 封，收回 25 封，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俞大絨、陳煥鏞、鄧叔群、羅宗洛、殷宏章入選，但與殷宏章得到同樣推薦人數的秦仁昌、李繼侗、湯佩松則未列入名單。基礎醫學組發信 56 封，收回 53 封，馮德培、張錫鈞、蔡翹、劉思職、馬文昭入選，但獲得較多人推薦票的謝少文、鐘惠瀾未列入名單。醫學組發出 56 封信，收回 53 封，張孝騫獲得推薦最多入選，但與張獲得同樣人數推薦的著名病理學家、協和醫學院教授胡正祥（1896–1968）則未入選；而沈其震僅獲 3 人推薦，但他是中央衛生研究院院長（1956 年改名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爲了加強中國科學院與該院的聯繫，因此將沈列入學部委員名單。地質學古生物學發信 83 封，收回 59 封，黃汲清、謝家榮、李四光、程裕祺、張文佑、尹贊勳、孫雲鑄、楊鐘健、侯德封、孟憲民、斯行健、許傑、田奇王雋得票居前而列入，喻德淵雖僅得 9 人但由於李四光、許傑的特別推薦也被列入。地球物理組發信 21 封，收回 18 封，趙九章、塗長望、竺可楨、顧功敘入選，而傳承義、李善邦得票雖多但未列入推薦名單。地理組發信 21 封，收回 18 封，方俊、任美鏗、黃秉維、陳承齡、夏堅白、王之卓居前，但得票都不高，故最初無人入選，後來決定以黃秉維一人入選。

技術科學部發出 125 封信，至 54 年 7 月底收回 78 封，得推薦票最多的是 8 票，其次是 7 票，均只有 2 人，再次就是 2 票，得票

很低且相當分散，⁴⁷ 僅蔡方蔭、侯德榜等人得票高一些。後來由科學院與中央政府的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建築工業部、水利部等部門協商選定了 30 餘人。

此外，農學林學和土壤學方面得票也很分散，其初選名單也是在與農業部、林業部等有關部委協商後確定的。

社會科學部的推薦標準與其他三個學部有較大差異，其標準是：1、學術水準，在本門科學有一定成就；2、以馬列主義解決問題；3、適當照顧到各方面代表人物。採用類似的標準由來已久，早在 1949 年推選社會科學界代表參加新政協時，就基本上排除了非馬列主義的學者。這一標準決定了這個學部選聘的幾乎只能是馬列主義一派的學者和官員（27 位黨員），這是當時社會科學意識形態化和強調黨性原則的反映。由於標準不同，該部採用的推選辦法與其他三個學部都不同。社會科學方面，是先由科學院黨組就歷史學和考古學、經濟學、哲學、文學和語言學等學科，以有關專門委員會名單為基礎提出初步名單再與中宣部科學處研究，然後徵詢了北京的部分專家的意見而推定的。據參與其事的劉大年回憶，社會科學學部名單擬出後變化不如自然科學方面大。⁴⁸ 但實際上，該學部的委員也從最初的 42 名最後增加到 61 名。

(三) 反覆協商、審查與人選的不斷變動

中國科學院在 1954 年 7 月的院務常務會議上決定在當年 8 月底

47 《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學部委員的推選經過和學部委員名單的報告》，1954 年 11 月 22 日及其修改稿，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48 劉大年，〈學部的籌建及其歷史作用〉，《院史資料與研究》1991 年第 6 期，頁 38-42。

或九月初成立學部，即在 8 月底確定學部委員人選，但由於種種原因，直到當年 11 月 11 日，學部委員名單才提交院務常務會議進行第一次討論，這個初次名單中，數理化委員 31 人，生物學地學 57 人，技術科學 35 人，社會科學 42 人，總數為 165 人。竺可楨說：「前三者以票選，大概占 1/4 票數者入選，但亦不盡然，如農學俞大緘、土壤陳華夔均未當選。醫農工，與企業部門接洽，改變較大。社會科學完全以協商方式。」⁴⁹ 當天和 11 月 18 日的院務常務會議討論決定增加李國平、陸學善、錢臨照、孫承諤（以上物理學數學化學部）、陳世驥、吳征鎰、侯光炯（以上生物學地學部）、王亞南（社會科學部），技術學部增王之璽而刪去周志宏。醫學方面，原有名單人數過少，經與衛生部黨組（賀誠為書記）商定，謝少文、鐘惠瀾被補入，肖龍友、陸淵雷作為中醫方面的代表列入，其他人選則考慮了醫學各分支的均衡和代表性。至 1954 年 11 月底，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上呈報了 177 人的名單。其中，物理學數學化學部 33 人，生物學地學部 65 人，技術科學部 35 人，社會科學部 44 人。⁵⁰

根據中宣部的指示，這一名單又進一步徵求了各學部籌備委員會專家以及被推薦者所在高校黨組、所屬部黨組、所在省市黨委（宣傳部）等方面的意見。到 1955 年初，各方面回饋的意見不少，摘要如下：

高校方面，北京農業大學提出增加熊大任、婁成後、湯佩松、周明艷、黃瑞綸五人、並推薦林傳光供考慮（除湯佩松外，余均為農大

49 據竺可楨 1954 年 11 月 11 日日記，見《竺可楨全集》第 13 卷，頁 559。按陳華夔應為陳華癸（1914-2002）。

50 《中科院有關學部委員工作的意見及學部委員名單、專長簡歷和對名單的意見》，1955 年，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教授)；北京大學認為除社會科學外，其他各學部黨的力量較弱，南方科學家較少，中醫只有肖龍友 1人⁵¹ 應有增加，並提出張青蓮業務水準較低，丁瓚不如潘菽，羅爾綱在史學和馬列主義理論方面都較差，劉大年學術上較差，馮友蘭是否考慮不列入（因哲學是黨性的科學），並提議增加李汝祺、湯佩松、樂天宇、趙以炳、王力、魏建功和游國恩；北京師範大學認為張如心學術水準不高，提議重新考慮；中國人民大學認為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三人值得重新考慮，提議增加該校尙鉞、何幹之、宋濤三教授。

中央部委方面，林業部、水利部、鐵道部均同意原提名人選，而第一機械工業部提出增列該部技術司一等二級工程師陶亨咸，第二機械工業部提出增列劉鼎、錢志道，建築工業部提出增列劉敦楨、錢正英，農業部提出周拾祿、王綬、鐘敬林三人供考慮。

各省市黨委方面，北京市委宣傳部建議增加張光門、諸福棠、林巧稚、黃昆，而稱謝少文「歷史、思想、社會關係均很複雜」，建議重新考慮。南京市委宣傳部建議增加劉敦楨、方光燾、鄭寶鈞、李善邦、李方訓、張江樹、耿以禮，陝西省委宣傳部提議增加虞宏正。四川省委宣傳部提名楊允奎、楊開渠、柯召、徐中舒、劉為濤、黃克維供考慮。

以上意見，有的當即被接受，有的沒有接受，有的經過反覆考慮幾上幾下。總的看來，在吸收各方面意見後，學部委員的名單增加了40餘人。這一輪聽取各方意見和協商，兼有補充提名和進行政治審查和學術審查之義。經此一輪工作，學部委員的提名基礎進一步擴大，增強了代表性。但地區、部門和機構的主張，使學術水準要求有

51 實際上第一份名單還有陸淵雷。

所降低。

1955年3月初，科學院擬出第二份學部委員人選名單，這個名單人數增至220人。3月中下旬，中國科學院多次召開學部聯席會議和各學部籌委會會議，對名單進行了反覆審核，對名單有所增補，一度增至249人，陸續增加的人選包括姜立夫、王湘浩、吳文俊、黃昆、胡甯、孫承諤（以上數理化）~~、~~崔之蘭、蔡邦華、馮澤芳、湯飛凡、張孝騫、林巧稚、俞建章、夏堅白、孫敬之（以上動植物、農林、醫學、地質、地理）~~、~~嚴愷、周志宏、孫德和、侯祥麟、馬大猷、吳學蘭、江澤民、朱物華（以上土木水利、化工礦冶、機電）~~、~~馬衡、鄧拓、楊向奎、張奚若、黃松齡、錢俊瑞、王亞南、馬特、馬敘倫、茅盾（以上社會科學）等。⁵²在討論過程中，名單又不斷調整。如北大張景鉞教授反對其夫人北大教授崔之蘭列入，而主張列入北大教授趙以炳；生物學地學組主張剔除沈克非、陸淵雷；華羅庚反對增加姜立夫；~~、~~社會科學部，潘梓年報告主張去除華崗、楊向奎、馬衡、馬特，而增加鮑爾漢、李儼和冀朝鼎等等。其中，~~、~~社會科學部一度增設政治、法律、教育組，這一組包括6人，即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周~~、~~甦生和政治學者錢端昇，他們都是首屆中研院院士，作為政治學和法律方面的代表；而教育方面則為當時的高教部部長楊秀峰、高教部第一副部長黃松齡、中國人民大學黨組書記兼副校長胡錫奎和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4人，都是中共資深幹部~~、~~他們的政治背景差異很大。1955年4月初院內審議時，該組被撤銷。

1955年4月2日，中國科學院黨組會議討論了學部委員、常務

52 竺可楨 1955年3月13日日記載有增入名單，《竺可楨全集》第14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頁45。

委員和學部主任、副主任等名單，決定增加陸淵雷，刪去孫承諤、孫敬之以及政治、法律教育組，並決定就翁文灝由於曾任行政院長且名列主要戰犯中的歷史問題、華崗由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而不列入學部委員的原因對中共中央作出說明。⁵³ 4月7日，院務常務會議審議學部委員名單，從249人名單中去掉了姜立夫、孫承諤、崔之蘭、沈克非、孫敬之、鐘林、江澤民、馬衡、楊向奎、和政治法律教育組原有名單（黃松齡除外，他被移到經濟學組），增加丁瓚、紀育澧、樂森瑋，⁵⁴ 而通過了238人的名單。這份名單隨即報送中宣部轉呈中共中央審核。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國科學院工作和學部委員名單，據參加此次會議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當日日記記載：「今天下午三時，政治局會議，討論問題為：科學院的工作檢查報告、學部委員名單……對於科學院的領導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滿。對學部委員名單，少奇同志指出必須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學術上有地位的人；共產黨員的安排亦必須是有學術貢獻的，不能憑資格和地位，黨派去在科學機關服務的人則不能以學者資格出現，要老老實實為科學服務。共產黨員不能靠黨的資格作院士！」⁵⁵ 但稍後科學院審核黨員學部委員名單時，並沒有嚴格執行劉少奇的指示。

（四）最後審查和名單的確定與公布

5月初，中國科學院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對238人的名單進行了一一審查。這次審查的標準，見於中國科學院黨組5月9日致中

53 中國科學院黨組1955年4月2日會議紀要，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54 據竺可楨1955年4月7日日記，見《竺可楨全集》第14卷，頁60。

55 《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上冊，頁199。

共中央宣傳部函。⁵⁶ 該函對學部委員標準作了進一步的說明：

「關於學部委員的標準，我們首先是從學術水準和政治情況兩方面考慮，確定總的原則：『學部委員必須是學術水準較高，在本門學科中較有聲望，政治上無現行反革命嫌疑的人，才能擔任。』但由於我國目前科學基礎仍很薄弱，學術水準一般不高，各門學科的發展亦不平衡，舊科學家政治情況又比較複雜等具體情況，我們又根據總原則的精神和中國科學界的情況，提出下列七條具體原則作為審查與修改原有學部委員名單的依據。這七條中前三條是屬於不應列入學部委員的，後四條屬於應列為學部委員的。現分述如下：

- 1、學術水準較高，但政治上有嚴重的現行反革命嫌疑者，不應列為學部委員。⁵⁷
- 2、學術水準較高，目前雖無現行可疑情節，但因歷史上有嚴重惡跡為科學界所不滿者，不宜列為學部委員。
- 3、學術水準一般，在本門學科中威望不高者，不宜列為學部委員。
- 4、學術水準較高，政治上雖有某些可疑情節，但無適當理由向科學界進行公開解釋，或因國家建設的需要，目前擔任著國家機關或企業廠礦重要職務而不能不用者，仍應列為學部委員。

56 王中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徵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頁40。

57 此條在1955年5月中旬最後審查時改為：「學術水準較高，但政治上有嚴重的現行反革命嫌疑，並有適當理由向科學界進行公開解釋者，不應列為學部委員」，參見《關於推選學部委員向中央的報告》，1954-55年，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 5、學術水準雖然不高（政治上也無可疑之處），但因該學科人才十分缺乏，必須適當照顧，仍應列為學部委員。
- 6、舊科學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學術水準不高，有的學術觀點陳舊甚至反動，為了照顧舊的科學傳統，亦應列為學部委員。
- 7、由於工作需要，黨派到各學術部門從事學術組織工作的共產黨員，雖然學術水準不高或懂得學術很少，亦應列為學部委員。

依據此原則，對原有 238 名學部委員名單進行一一審查後，保留其中的 224 名。其中，鮑國寶、趙宗燠、蔡金濤、黃鳴龍、胡經甫、謝少文因屬上述第 1 類情況，陳嶸、劉思職屬第 2 類而被剔除，魏建功、丁瓚、劉恢先、劉鼎（黨員）、冀朝鼎（黨員）、魯之俊（黨員）、陳康白（黨員）⁵⁸ 7 人因「學術水準一般，在本門學科中威信不高」而不列入；王力、黃汲清、程裕祺、謝家榮、湯飛凡、周仁、胡先驕、湯佩松 8 人屬於第 4 類而保留在名單中；張鈺哲、梁樹權、張青蓮、黃秉維 4 人則屬於第 5 類情況而入選；陶孟和、馬寅初、金岳霖、馮友蘭 4 人則屬於第 6 類而保留。而張稼夫、惲子強、武衡、趙飛克、劉大年、李亞農、李文采 7 人屬於第 7 類予以保留。第 7 類說明是對劉少奇批評的回應。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在一開頭就說明學部委員不同於院士，乃是「在院務會議下成立四個學部，吸收院內外科學家，組成學部委員會，分別領導各研究所的工作，以加強學術領導」。

58 陳康白時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但當時一度決定調離中國科學院，故未列入學部委員。

1955年5月12日，中國科學院黨組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再次對名單進行了討論和修改。這次修改，名單又進行了若干改動。因政治原因而被排除者有鮑國寶、趙宗燠、蔡金濤、湯飛凡、陳嶸、劉思職、胡先驌，⁵⁹而黃鳴龍、胡經甫、謝少文3人經過甄別而被列入第4類而入選，原來第4類人物王力、黃汲清、程裕祺、謝家榮、周仁、湯佩松6人保留。因學術水準不高而被剔除者增加了丁西林、喻德淵、陸淵雷3人，而原來因「學術水準不高」而被剔除的北大教授魏建功被重新評價而列入名單。此外，陶孟和等4人、張稼夫等7人名單不變。除此之外，經反覆研究，又新增了13人為學部委員，其原因為「有的學術水準較高，有的在研究工作中有突出成績」，他們是：虞福春、秦仁昌、楊維義、趙洪璋、陳文貴、吳英愷、黃家駟、周澤昭、諸福棠、梁伯強、葉橘泉、承澹庵、馮至、魏曦。其中，趙洪璋（1918–1994）是西北農學院副教授，因育出碧蚂一號小麥而知名，當選學部委員之後的次年才晉升為教授。這13人中以醫學專業為最多，有9人。其中，陳文貴、梁伯強、葉橘泉為衛生部黨組推薦；周澤昭曾任第一軍醫大學校長，當時為北京醫院院長、毛澤東的保健醫生；葉橘泉為中藥專家，時任江蘇省中醫學校副校長；承澹庵為針灸專家，時任江蘇省中醫學校校長；陳文貴、魏曦均為細菌學家，曾赴朝鮮參加過反細菌戰調查並獲獎。中醫增至3人，乃是由於當時正在調整中醫政策，中醫正受到重視的背景。而衛生部黨組書記賀誠雖然採取了增薦中醫界學部委員的行動，卻在學部委員名單公

59 鮑國寶、趙宗燠、蔡金濤和湯飛凡屬於「因政治上有嚴重的幹革命嫌疑（現行的），已為公安部門列為專案偵查物件，可以適當理由進行公開解釋，不擬列為學部委員者」；陳嶸、劉思職、胡先驌三人屬於「因歷史上有重大惡跡，為科學界所不滿，不宜列為學部委員者」。

布不久就遭到公開批判，被撤銷了衛生部黨組書記和副部長等職務。⁶⁰至此，學部委員名單確定為 235 人。

5 月 31 日，國務院第十次全體會議批准 233 人，其中細菌學家、協和醫學院教授謝少文與北大物理系教授虞福春未獲批准，原因不詳。6 月 3 日周恩來總理簽發了國務院命令：「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名單共 233 人，已由 1955 年 5 月 31 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十次會議批准，現在予以公布」，其中物理學數學化學部 48 人，生物學地學部 84 人，技術科學部 40 人，哲學社會科學部 61 人（詳見附表 1）。學部委員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聘任。1955 年 6 月 1 日至 10 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成立大會，會議期間推選了學部常委，確認了各學部的名稱和負責人選。

總的看來，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 233 人中，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和生物學地學部的委員是以學術界的推選為基礎產生，技術科學部和社會科學部的委員則以協商為主產生。學部委員的組成主要有三部分：1、各學科帶頭人和學術中堅，2、各學科資歷較深的學者或元老，3、在中國科學院和全國科學界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部分中共黨員幹部。

三、學部委員選聘中的幾個問題

(一) 學部委員與院士的異同及其選舉的差別

在中研院早期體制中，評議會是全院學術評議的最高機關並選舉

60 王龍，〈軍隊醫療事業的奠基人賀誠〉，《炎黃春秋》，2007 年第 4 期。

院長候選人，院士會議的主要職權是選舉院士和評議員，因此中研院院士主要是一種學術榮譽稱號。蘇聯科學院院士則不但是一種很高的學術榮譽，而且在院中擁有一系列權力，從對研究所的領導到選舉院長、院士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則僅有蘇聯科學院院士對研究所的學術領導的部分權力，且其權力未從法律上保障。中國科學院在學部成立之後，雖通過《學部暫行組織規程》，卻沒有任何條文闡述學部委員的權力和職責。在張稼夫等院黨組幹部眼裏，學部委員是黨領導科學的助手。

由於學部委員與院士的上述不同，其推選與院士的選舉方法也截然不同。蘇聯科學院和早期中研院的院士選舉是學術精英自主選舉學術精英，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則是由科學界和黨政幹部等聯合推舉的，即由科學院黨組、中宣部黨組領導，學術秘書處和各學部聯合承辦，教育、衛生、產業等部門參與協商，再經科學院黨組、中宣部審定，最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先後討論審核，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結果。

蘇聯科學院的院士選舉和中研院首屆院士選舉都有嚴格的選舉辦法。以中研院為例，首屆院士選舉之前，立法院通過了修訂的中研院《組織法》與《評議會條例》，國民政府隨即頒佈這兩個法律檔，從法律上保證了院士選舉由中研院自主、獨立進行。隨後，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依據《組織法》和《評議會條例》，制訂《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規程》，就分組、名額以及選舉過程的各個環節都作出了細緻可行的規定。此後，院士選舉就嚴格按照《選舉規程》，由中研院評議會自主運作，排除了政治和權力的干預，這是院士選舉成功的先決條件。而院士選舉的成功實施，則依賴於評議員們學術良知和公心。決定一位學者是否當選，並不單純是學術水準決定的，候選者的人脈關

係也有影響。但學術水準的評斷是很複雜的，不同學科名額之間的平衡也耐人尋思。而由於時局不寧，選舉提名時間比較倉促，多數機構只提名本機構人員（這是中共批評的學術界的宗派主義的表現之一），有一些優秀的學者沒有進入候選人之列，使首屆院士不乏遺珠之憾。⁶¹據夏鼐 1948 年 4 月 20 日致傅斯年信中說：「名單發表後，外界一般意見，以為較候選人名單為佳，以其標準似較嚴格也。惟有少數人批評其缺點：(1)遺珠甚多。(2)當選者，與中央研究院同仁及有關人物過多。（此以『近水樓臺』之故，自所不免。）(3)老輩中有許多早已不做研究工作，且年輕時亦未曾有重要貢獻之研究工作，所謂『科學界中的政客』。雖有院士資格第二項可言，但嫌所占比例太高。」⁶²這大體代表了時人對於中研院首屆院士選舉的觀感。然而，中研院院士選舉所體現的學術自主和獨立並沒有為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人所認識。在張稼夫等黨組領導人的眼裏，中研院院士是「蔣的院士」。⁶³所以在推選學部委員時，中國科學院沒有借鑒中研院的經驗，而主要參考了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會委員推舉的經驗，甚至不如聘任專門委員規範。專門委員聘任時，中國科學院制訂了《專門委員聘任暫行辦法》，經院務會議和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批復准予備案，而學部委員的推選沒有制訂選聘辦法，而是不斷摸索，隨時調整。這表明中國科學院準備不足，且沒有認識到嚴格規範推選的重要性。由此而發生了名單不斷擴大變化，學部成立日期不斷推遲等現象。這也是黨領導體制的特

61 郭金海，〈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節院士的選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2006），頁 33-49；周雷鳴，〈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南京社會科學》2006 年第 1 期，頁 78-86。

62 引自羅豐，〈羅豐、夏鼐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考古與文物》2004 年第 4 期，頁 84-89。

63 參見中國科學院 1955 年 2 月 9 日黨組會議記錄，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點，不拘於條條框框，隨機應變，誠所謂「摸著石頭過河」！

學部委員的提名，除哲學社會科學部之外，其他學科都經過了先專家提名，後組織補充的過程，與中研院院士候選人以機構、大學提名為主不同，提名面更寬。但是，在提名、推薦和審定的過程中，非學術的因素影響較多。

黨組的決定作用自不用多說，大學、衛生部、產業部門等方面參與協商，也有重要的影響。最突出的是衛生部，醫學方面的學部委員以衛生部黨組意見為主，結果三位中醫和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入選，協和醫學院等所屬現代著名醫學家受到壓制。中國科學院第一次呈報的學部委員名單是 177 人，但經過與這些機構的協商，學部委員的人數就增加 40 餘名，達到 220 人以上，這勢必降低學部委員的學術成就標準。蘇聯科學院院士候選人需獲得所在學部院士 2/3 以上票數才能當選；中研院首屆院士選舉進行了分組和評議員兩輪投票，最後當選者在分組投票中的得票率絕大多數都在 2/3 以上，評議員投票需獲得 4/5 以上才能當選；而學部委員僅進行了一次推薦投票摸底，有約 1/3 的獲選者在摸底投票中得票率在 1/3 以下，社會科學部連這一輪摸底也取消了，因此學部委員的權威性不足。1957 年中國科學院增補學部委員時，院黨組提出「主要從學術水準考慮，不要著重從照顧學科、地區、部門考慮。因為不全的缺點，以後還可以增補，如果有人選不當，則反會引起被動，更增加團結的困難」。⁶⁴可見這種協商的結果在後來的中國科學院黨組看來也不好。

綜而論之，在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的選聘中，學術成就是基

64 〈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增補學部委員的請示報告〉，引自《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1957年》，頁 79-81。

礎，政治過關是必要條件，所在部門、學校或單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選的結果，雖然大多數優秀科學家進入學部委員的行列，但部門、單位的參與協商降低了學術成就的標準，政治審查使小部分中國一流科學家未能入選。選聘程式不夠嚴格規範，入選資格執行多重標準。雖說大體上可視為成功，但也留下了不少遺憾。

(二) 院黨組、中宣部領導和黨員學部委員

中國科學院黨組是以張稼夫為首的行政幹部為主，加上潘梓年、尹達等少數黨內專家學者。但張稼夫、潘梓年、武衡、尹達等人以及前一屆黨組成員惲子強、劉大年⁶⁵等都入選學部委員。中宣部以陸定一部長為首，副部長陳伯達、胡喬木、科學處處長於光遠等人，他們的學術背景都不深，但在當時被奉為理論權威，他們被選聘為學部委員似乎不容置辯。他們本來就處於領導地位，被聘為學部委員，不過是給他們增加了一個頭銜。儘管郭沫若一開始就提出「寧缺勿濫」的原則，劉少奇指示「共產黨員不能憑資格和地位」，但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選聘。他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科學院和中國科學事業的具體執行者，「由於工作需要」，「雖然學術水準不高或懂得的學術很少」，也不能不是學部委員。但從丁西林、喻德淵、劉恢先、劉鼎、陳康白、魯之俊等同屬「由於工作需要」擔任學術部門和機構要職，而由於「學術水準一般，在本門學科中威信不高」最終落榜的這些人的角度看，中科院黨組和中宣部黨組領導似掌握著雙重標準，他們入選學部委員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嫌。⁶⁵ 在 233 名學部委員中，中共黨員總共

65 中宣部長陸定一是個例外，他沒有當學部委員，見龔育之，《黨史筭記末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 193-194。

有 42 名。⁶⁶ 其中尤以哲學社會科學部爲多，有 28 名，加上郭沫若等，黨員占其近半，的確是實現了馬列主義的學者佔據主要陣地的初衷。在屬於科學技術領域的另外三個學部，黨員有 15 人，包括來自延安等解放區的暉子強、沈其震、周澤昭、陳鳳桐、武衡、李強、趙飛克、錢志道，地下黨員吳征鎰、李文采，以及新入黨的錢三強、黃家駟、塗治、陶亨臧，此外還有 1938 年就秘密入黨的侯祥麟。這 15 人中，獲得博士學位者 6 人，碩士學位 2 人，學士學位 6 人，還有一位大學肄業，他們的教育背景都不低，且大多在科研機構擔任重要的行政職務。⁶⁷ 但除了四位新入黨的專家之外，其他人在學術上都沒有什麼重要建樹，他們大都是憑藉其職位而名列學部委員之中。

1957 年，學部委員第一次增補時，一度也做效原來的做法，提名接替張稼夫的院黨組書記張勁夫、黨組成員兼秘書長裴麗生和哲學社會學科部副主任劉導生三位黨政官員爲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並經科學院院務常務會議及學部常委會討論通過。但張勁夫等認爲，科學家雖然表示贊成，估計還有不少人是有意見的，因「上次列進去的一些作科學行政組織工作的黨員同志，科學家們也是有意見的，經過解釋後，才勉強認可的」。張勁夫等經過研究後，向中宣部、中共中央提出：「目前情況已和前次學部成立時情況不同，當時國家社會主義改造任務還未完成，思想戰線上階級鬥爭相當緊張，在考慮學部委員名單時，要從學術、政治及工作需要三方面結合考慮，因此，有一部分作科學行政組織工作的黨員，由於工作需要，也列爲學部委員。現在情況已有變化，學部委員人選主要應從學術方面考慮，如果學術水

66 此外，郭沫若、侯祥麟爲中共秘密黨員，當時其黨員身分尚未公開。

67 參見：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 年第 4 期，頁 46。此文列出了黨員學部委員名單，但遺漏了周澤昭和兩位秘密黨員。

準不夠，僅因為是黨派去做科學行政組織工作，而就列為學部委員，就會使科學界有一種特殊之感；因此，我們主張這次不增補張裴劉三同志。至於以前有些做科學行政組織工作的黨員已列為學部委員，有的並已調動工作，我們意見，應在適當時機提出辭職。」⁶⁸張勁夫等人沒有自封學部委員，且有上述提議，表明他們對於這部分黨員學部委員並不認可。

(三) 學部委員資格中的政治標準

學部委員資格之三「忠於人民的事業」是一條政治標準。1954年5月7日學術秘書處討論學部委員的標準時，對於加上此一標準的效果雖有顧慮，但仍然認為須有此條。這一條標準究竟如何掌握？1954年1月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時指出：「團結科學家是黨在科學工作中的重要政策。科學家是國家和社會的寶貴財富，必須重視和尊敬他們，必須爭取和團結一切科學家為人民服務。對於少數歷史上有過反革命活動的科學家，也應當爭取並適當地加以使用，對於個別潛藏的現行反革命犯則必須提高警惕。……至於有不少科學家在思想作風上仍然不免帶有較濃厚的舊社會的影響，只要不是做反革命活動，就不要對他們求全責備。不能像要求一般政治工作幹部一樣要求科學家，更不應因此而鄙棄和歧視他們。固然我們對於科學家也應該進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但這種思想教育必須是長期地耐心地，來進行的，必須是在尊重他們的科學工作，發揚他們的科學研究的積極性的前提下，而不是以損傷他們的自尊心的方式來進行

68 〈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增補學部委員的請示報告〉，1957年5月3日，見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1957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1998），頁80。

的。」⁶⁹這一指示實即學部委員政治審查的指針，重在非「現行反革命」。

但由於思想改造運動以來對知識份子信任度低，使政治審查時懷疑面較大，對審查物件歷史上的政治態度、表現和社會關係等都一一進行排查。如北大王力教授，由於曾與李宗仁、黃旭初、胡適關係密切，在擔任嶺南大學教授時為五人顧問委員會成員，1950年曾到香港彙報校務，被視為「向美帝國主義彙報情況」，被當作嚴重的政治問題，因此在第一次名單中被刪除。俞大緘、俞建章、劉思職、黃鳴龍等人，或因家庭關係原因、或因所謂歷史上的「反動言行」等問題，而被排斥在最初名單之外。但隨後政治條件有所淡化，在1954年11月22日後修改上報名單時，胡先驕、黃鳴龍等被補入，院黨組在給中宣部的報告中說明胡先驕「解放前政治上很不好，但他是植物學界前輩，學術水準較高，故列入」。

科學院黨組和中宣部的領導人主導著學部委員人選的政治歷史問題審查。隨著1954年底批判胡適思想和1955年初批判胡風運動的興起，專家學者的政治立場作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凸顯出來。中宣部是這兩場運動的組織者，中國科學院也是批判胡適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因此，在最終審定學部委員名單時，政治標準又趨嚴格。1955年5月最後審查時，政治標準進一步細化成三條（見前述）。依據此原則，湯飛凡、鮑國寶、趙宗燠、蔡金濤等因「現行反革命嫌疑」，陳嶸、劉思職、胡先驕因「歷史上有重大惡跡，為科學界所不滿」最終被淘汰。此時，馮雪峰、華崗等中共黨員尚且受胡風等牽連而被淘汰，湯飛凡等有歷史甚至「現行」政治問題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69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頁164–165。

對於學部委員的政治標準，兩年之後，在 1956 至 1957 年增補學部委員時院黨組有新的認識。當時提出，「政治條件只要政治上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判刑管制分子，其學術水準確定夠條件者均可列為考慮名單以內」，⁷⁰ 即淡化處理歷史上的政治態度和表現。湯飛凡等因政治問題而未獲選首批學部委員的人，在 1957 年 5 月被增補為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黨組對此解釋說：「此次增補的學部委員中，就其學術水準，上次本已考慮列為學部委員，當時或因政治上有些問題未搞清楚（如湯飛凡、趙宗燠、鮑國寶），或因思想反動，過去發表過反共宣言（如劉思職）未有列上。我們在研究名單時，曾向聶總、周揚同志請示，並提出建議：對政治問題，經過幾年的考查，有的系歷史上的政治問題已經查清，有的在解放前後僅有某些可疑而又不能證實者，如學術水準確夠，此次可考慮增補，萬一將來發現有政治問題，也可依法處理，我們並不被動。對思想反動問題，這幾年科學界面貌已有很大變化，本人也多少有些改變，如學術水準確夠，也可考慮增補。上述建議，聶總、周揚同志曾表示同意，此次的名單上已增補進去。」⁷¹

(四) 對待中研院首批院士問題

在選聘學部委員時，如何對待留在大陸的中研院首屆院士，一直是個話題。雖然原來的院士不被中國科學院承認，但在學部委員的選聘過程中，曾就此進行專門的研究。

70 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增補學部委員的意見」，1956 年 10 月，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71 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1957 年》，頁 80。

中共中央、國務院分管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副總理陳毅指出：「一九四八年國民黨選的一批院士，也是有一定的標準的，雖然當時是在朱家驊等反動份子的控制下進行，但科學家們曾為選舉郭院長為院士而有鬥爭的。儘管解放後我們在事實上已把他廢除了，也要加以分析，不能把他們和胡適等反動份子等同看待，其中大部分人是好的，要很好地團結他們」。⁷² 郭沫若甚至提出，如果中國科學院建立院士制度，要把以前的院士全部包下來，也就是一概保留。⁷³ 一般說來，科學院黨組對他們的政治審查是一視同仁的，甚至可以說比較寬。自然科學方面的原中研院院士沒有入選學部委員，大都不是出於中國科學院黨組的意見。

胡先驕雖不在最初的推薦名單之列，⁷⁴ 但到 1954 年 11 月中國科學院黨組第一次向中宣部提出學部委員名單時，胡先驕已被補入。後來幾經審查，一直到 1955 年 5 月 9 日，在院黨組審定的名單中，都還有他的名字，被列入「學術水準較高，政治上雖有某些可疑情節，但無適當理由向科學家進行公開解釋或因國家建設的需要，目前擔任國家或企業廠礦職務又不能不用者」之中。但僅僅三天之後，5 月 12 日，在院黨組最後審議時胡先驕因「歷史上有重大惡跡，為科學界所不滿」而遭淘汰。何以僅僅相隔三天，胡先驕就從「政治上雖

72 〈陳毅 1955 年 3 月 19 日在中國科學院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見《中國科學院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紀要》，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73 《中國科學院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紀要》，1955 年 3 月，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74 胡先驕未在植物學組名單之列，原因不明。或因胡未得任何人的推薦，或是胡已預先被排斥在外。在 1949–1950 年的自然科學專家調查中，胡先驕在植物分類組居第 7 名，由此可知在推薦學部委員時胡先驕得票可能不多。胡在植物學界的人緣不佳，這也是他在 1957 年學部委員增補時仍然落選的重要原因。參見：胡宗剛《胡先驕先生年譜長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頁 589。

有某些可疑情節，但無適當理由向科學家進行公開解釋」而入選學部委員之列被打入此等，原因不明。有人認為是他在 1949 年以前的政治歷史問題，有的認為乃是由於他在所著《植物分類學簡編》（1955 年 3 月出版）中批評李森科，遭到蘇聯專家的抗議所致，那時適逢其會。可能以後說為是。1957 年增補學部委員時，「本擬增補（胡先驌），可是不少科學家認為胡不僅是思想反動問題，學風也很惡劣，都不贊成增補，故未列上」，⁷⁵ 那就不是政治的原因了。

姜立夫是數學界的元老，但他僅得 6 票推薦，故未入第一次推薦名單；後來一度考慮把他補入，但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數學家華羅庚反對他。竺可楨記載：「聞華羅庚竭力反對薑之加入，動機尚是陳省身為姜之學生，而姜把〔中研院〕數學所書籍移臺灣實是極大損失」。⁷⁶ 華羅庚、陳省身是中國頂級的數學家，但兩人有競爭關係，華在西南聯大任教時一度想進入中研院而不得，且華在清華大學被前輩所壓制，⁷⁷ 故遷怒於姜。另外，科學界的元老還有一些，如果姜立夫補進來，在數理化組就有化學界元老、清華大學教授張子高也有理由補入，故數理化組主張他們兩人都不要列入。⁷⁸

翁文灝因為曾經擔任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名列 1948 年底中共公布的 43 名頭等戰犯中，1951 年返回大陸後已脫離科學界，自不在考慮之列。

李宗恩在醫學組得到的推薦票數列第五，與他在 1948 年以全票

75 薛攀皋、季楚卿編，《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1957年》，頁 80。

76 見竺可楨 1955 年 3 月 23 日日記，《竺可楨全集》第 14 卷，頁 51。

77 徐利治，《我所知道的華羅庚與陳省身——徐利治先生訪談錄》（徐利治口述，袁向東、郭金海訪問整理），《書屋》2007 年第 5 期，頁 16-24。

78 《竺可楨全集》第 14 卷，頁 51。

當選院士今非昔比。最初名單中西醫方面僅有張孝騫、沈其震兩位，因此輪不上李宗恩。他從 1947 年起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但由於中美交惡，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校成了「崇美」、「親美」的反面典型。燕大校長陸志韋雖因同情和保留進步學生，在解放前夕拒絕南遷，護校有功，1949 年作為「特別邀請人士」出席了新政協，但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了剷除「美帝國主義」在教育界的影響，陸志韋被「黨中央」列入「批倒」之列，多次檢討無法過關，出現精神病症狀，不久被調離學校。⁷⁹ 李宗恩是 1949 年出席新政協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思想改造運動中經過自我批判過關，雖繼續擔任協和院長，但從前後得票看，他的處境已非。在科學院與衛生部黨組討論學部委員人選時，衛生部提出，「因軍委衛生部不同意協和教授參加學部委員太多」，且張孝騫政治上有可疑之處，故考慮將張從名單中刪除，而代以他人。⁸⁰ 協和教授張孝騫得票最高尚且難以上榜，李宗恩自然沒有任何希望。兩年之後，李宗恩被打成了「右派」，不久被放逐到昆明，1962 去世。⁸¹ 後來張孝騫通過了政治審查得以保留，而另一位協和教授謝少文則是國務院最後審查時被拿下的兩人之一。

吳定良是著名的人類學家，原屬生物組院士，但他的專業體質人類學沒有列入在中國科學院 1949–1950 年的調查範圍之內，也不在學部的學科分類之列。在學部委員選聘的一份中研院首屆院士名單中，他被列為「情況不清」者，可能不是有意排除他。

79 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頁 10–12。

80 中國科學院黨組致中宣部長陸定一的信，1955 年 3 月 16 日，見《關於推選學部委員向中央的報告》。

81 李宗蘗，《李宗恩的最後四年——日記解讀》，學術中華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830>

人文組院士，周~~姓~~生、錢端昇、陳達當是由於他們所研究的法學、社會學等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學科而被淘汰或不予考慮；顧頡剛由於其歷史問題而被排除在學部委員之外；⁸²張元濟和柳詒徵則由於年老病弱，無法履行學部委員之職責而沒能入選。而金岳霖、馮友蘭、陶孟和、馬寅初等由於照顧「舊的科學傳統」而保留。陳寅恪申明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經請示毛澤東批示同意「要選上」而保留。⁸³當時對於一些「舊」史學家的學術成就還可以認可，但對於不屬於馬列主義系統的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十分輕視。在討論是否建立院士制度時，中科院黨組認為，如果以學術成就為標準，那麼馮友蘭、金岳霖、馬寅初等人就屬於「學術上沒有成就的人」難以入選。可見在張稼夫等人看來，非馬列主義的社會科學根本就不是學術。秉持這種觀念，他們自己成為學部委員理所當然，而排斥異己也是必然。而金~~嶽~~霖等雖為學部委員，其實則有名無實。⁸⁴這種選擇對社會科學在

82 顧頡剛 1955 年 6 月 4 日的日記記載了他對自己落選學部委員的認識：「今日靜秋（顧頡剛夫人——摘錄者，下同）見報上發表科學院學部委員名單無予名，頗責予之不進步，以致被擯。然社會科學黨中有不少名家，不似自然科學之悉取材於黨外也（實非如是）。觀黨中歷史學界如尚鉞、稽文甫、華崗等尚不在內，更何論於予耶？『為善無近名』，予得解除名之桎梏，亦可喜也。聞此次學部名單，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方面之委員系由各專家票選，而社會科學部之委員則由黨方圈定。予於馬列主義尚未入門，固不當預此選也。生物學部中無胡先驕，大是怪事。渠一生未脫離研究崗位，亦未參加過反動政治，何乃排拒之耶？」（《顧頡剛日記》第 7 卷，頁 69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顧雖未被聘為學部委員，但他受邀參加了學部成立大會。

83 張稼夫，《庚申憶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 131。

84 金岳霖教授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可是有名無實，他回憶自己坐在辦公室等待「辦公」，可是根本沒有人找他，結果無「公」可辦。見金嶽霖，《解放後讓我坐辦公室辦公而「公」不來》，劉培育主編，《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增補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頁 66-67。

中國的發展造成的嚴重不良後果，至今難以根本扭轉。

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81 人，當時在大陸的有 57 人，其中 46 人當選學部委員，上述 11 人沒有獲聘學部委員。⁸⁵ 此外中研院首屆院士湯佩松、俞大紱、謝家榮等人入選學部委員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湯雖公認很有學術成就，但推薦得票不高，故最初並沒有列入，後被補入 1954 年 11 月的第一次名單。俞大紱因其兄俞大維是臺灣的國防部長，被懷疑與臺灣有聯繫，後來這個疑點被排除，才被列入。謝家榮因與翁文灝、宋子文關係密切，且當過國大代表，屬於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但他擔任地質部總工程師，對甘肅白銀廠和安徽銅官山的銅礦的勘察上有重大貢獻，在地質界享有很高威望，推薦得票很高而被列入。

(五) 「統戰」與科學界的代際矛盾

1948 年中研院首批院士在當時的學術界年歲偏大（陳省身、華羅庚等屬於例外）。與此不同，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除社會科學部之外有 38 位年齡在 45 歲以下的專家，⁸⁶ 最年輕的物理學家黃昆不滿 36 歲。他們多數人聲望遠不如那些科學界的元老，但其中不少人的學術水準並不遜色，甚至高過那些元老。在推薦過程中，他們得票並不高（少數如錢三強等除外），但得益于學部委員規模的擴大，而使他們受到注意。在審定協商過程中，他們中的一些學術水準出眾的人

85 另外，中研院首屆院士梁思永已於 1954 年 4 月 2 日逝世，余嘉錫於 1955 年 1 月 23 日逝世。

86 關於首批學部委員的人口特徵，請參見：劉翠溶，《院士的人口特徵：中央研究院與中國科學院的比較》，載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上冊（台北：允晨文化，2006），頁 279–328。

物逐漸浮現出來，如汪猷、黃昆、胡寧等人。他們的入選給首批學部委員群體帶來了生氣。這是協商選聘的收穫，如果按照得票多少進行選舉，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會被淘汰。

這三個學部委員中 55 歲以上者有 57 人，其中有一些人長期擔任重要的職務而較少從事研究，即資歷很深但學術成就不多不高，是科學界的元老和頭面人物，如科學院的幾位副院長、學部主任副主任、在大學或部門所屬研究機構擔任要職的一些人，就不乏此類要人。聘任這些老科學家是為了團結科學界的各路人馬，是尊老的表現。這種做法被一些學術水準較高而年輩較晚的學部委員批評為「搞統一戰線」。在 1955 年 6 月初學部成立大會期間，華羅庚、陸學善、楊鐘健、汪猷等人批評學部委員「統戰性太大」，「搞了不少不做研究工作的人」。華羅庚說：「這是不為研究工作著想，這樣搞，科學事業要推遲五十年」。他還說：「如果把不做研究工作的那些人去掉，我保證幾年之後就會有成績。我可以向科學院、向黨保證。如果不這樣，我也不搞了。」楊鐘健說：「搞來搞去還是那些人，什麼老科學家，壞就壞在他們手裏。他們不做科學工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陸認為生物學地學方面照顧得特別厲害。華、陸對吳有訓有很多意見，認為吳偷懶，作風很不好。華羅庚還認為許傑「不懂業務，即做生物地學部副主任。靠當部長吃飯（許傑時任地質部副部長——引者）」。陸學善批評嚴濟慈「從外國回來就不搞物理工作，此人是一貫好弄錢，⁸⁷不懂科學的人」。汪猷則認為，化學方面四個學部常委都不合適，「莊長恭病，黃子卿業務太窄（只研究物理化學中溶液電解問題），楊石

87 嚴濟慈在 1952 年思想改造運動中曾交代從 1940 至 1948 年以津貼名義「貪污 1600 美金」，見《竺可楨全集》第 12 冊（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頁 674。

先、曾昭掄久已不搞業務，提不出意見」。汪猷還認為曾昭掄的水準不高，作風很壞，大家有意見。汪猷還說：「學部是統一戰線，又照顧男女，又照顧中醫、西醫。如紀育灃研究了好幾年⁸⁷，自己還不知爲什麼，就是資格老，所以當委員。」⁸⁸

對科學界這些元老的尖銳批評，大體上與 1948 年中研院首批院士公布時人們的批評相似。但這些元老無論在 1949 年之前還是 1949 年之後，大都在中國科學界佔據重要的職位，是科學界的有權有勢人物。且他們的學生弟子很多，如果徵求民意，他們的得票也較多。雖然他們的學術在華羅庚一類的輩份較晚的學者眼裏已經過時，但他們仍然居於科學界的重要職位。這一問題，自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成立以來就一直存在。1935 年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成立時，設定評議員的資格之一爲「對於所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績卓著者」。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選舉時，該條原封不動保留爲「院士入選」資格，爲一部分研究成績平平的學術界大佬當選院士開了方便之門。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選聘過程中，其入選資格的第二條與院士資格第二條相似，是他們入選學部委員的依據。1950 年代初，一批留學海外獲得較高學位乃至在研究上取得較高的科學成就者歸國，他們開始對那些科學界的元老領導科學界的局面表示不滿。這些科學界的元老，最老的當時不過 70 多歲，大多不過 60 歲上下，有的也就 50 多歲，但科學技術發展迅速，在新一代眼裏，他們知識陳舊，長期脫離研究，在學術上沒有建樹，且可能壓制後輩。但中國科學界

88 以上資料引自《學部成立大會情況簡報》第 1-3 期，1955 年。關於紀育灃，竺可楨 1950 年 8 月 21 日日記記載紀育灃舊識陳康白等謂其「行政能力太差，不能與人合作，其下屬人皆不喜之」，見《竺可楨全集》第 12 卷，頁 163。

的這種「老人統治」並沒有因為他們的牢騷而動搖，直到「文革」過後的一些年還在延續。

此外還有一些資歷不夠深，名氣不夠大，有實學卻落聘的人對首批學部委員也有意見。如李善邦、傅承義、辛樹幟沒有被聘為學部委員，但應邀列席學部成立大會，他們在會上或者情緒不高，或者很有意見；還有的人對部分學部委員的學術水準提出了質疑。

針對這些意見，主管科學工作的副總理陳毅在6月2日學部成立大會第二天的會議上，呼籲科學家團結一致，支持首批學部委員。他認可學部委員選聘搞統戰，「學部就是科學界的政協」等說法，他說：

這次經過幾年的籌備，大規模地建立學部委員會。成立四個學部，有二百多位學部委員，……這是為了在新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下，在郭院長和各位副院長的領導下，建立一個學術領導機構，組織科學研究，發揮我國科學的長處，克服我國科學的落後性，提高學術水準和科學水準，為總路線服務。……中國過去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清朝政府、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的壓迫，科學不能得到發展。解放後，我們辛辛苦苦搞了這樣一個學術機構，凡是熱愛祖國、熱愛科學的人都要無條件支持這個會議，即使其本身有缺點，我們也應該主要看它好的地方。這是符合與國家利益和科學發展利益的。……我認為人選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不是說百分之百正確。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批准這個名單是有準備的，根據現在我們熟悉科學家和科學家熟悉我們的程度，根據我們相互間的瞭解和友誼，我們提出這個名單。……但名單可能有遺漏，可能埋沒真才。這也許是他的原因，也許是我們的原因，因此我們有個保留。這次的學部委員

名單明後天就要公布了，所以今年補不了，但應當補的大家可以提出，在明年第二次學部大會時，可與考慮補。共產黨任何時候都準備了人家的擁護，任何時候也準備承認錯誤。我今天儘量為名單辯護，但也承認可能有遺漏。另一方面，是否明年會拉下幾個人來呢？這也有可能。……名單可能有遺漏，我們就作個保留。身體不行的，水準不夠的，或是不願搞科學研究工作的，明年可以不放上去，「真才」可以補上去。我們共產黨絕沒有宗派主義，絕不會說是拉這個派，打那個派，把學生捧起來，把先生壓下去。共產黨絕不會這樣。如果有錯誤，那是因為不夠熟悉。大家可以相信，在新中國人才短期埋沒是可能的，但絕不可能長期埋沒；同樣的，短期蒙混是可能的，但長期蒙混絕不可能。……我們的學部也包括統戰，有人說這是科學界的政協，我想這提法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們的國家是協商的，為什麼科學界就不能協商呢！」⁸⁹

周恩來在學部成立大會上也說：「不是除 233 位以外就沒有人合乎條件了。不是的，還有人是遺漏的，有的條件雖夠，但在做行政工作或其他建設工作，就不必都列入學部委員了。也還有些人學術研究條件夠，但政治條件差一些，就等一等吧，政治條件也是具可變性的，現在政治立場模糊，以後清楚了，我們還是歡迎的。」⁹⁰

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的講話暫時平息了各方意見，但據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大會總結報告，在 1955 年 6 月 1 日至 10 日舉行的學部

89 陳毅副總理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55 年 6 月 3 日，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90 周恩來總理在學部成立大會上的報告，1955 年 6 月 7 日，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成立大會上，與會者未能就學部的職責、學部委員和學部常委的職責、以及學部和學部委員如何開展工作等重要議題達成明確的共識。⁹¹這既是中國科學院體制上黨政領導與專家學者的固有衝突所致，也因爲在學部成立的同時，中國科學院提出將在幾年之內建立院士制度，從而面臨學部委員如何向院士制度過渡的問題，使學部委員的性質難以確定。此後，中心問題就是學部在中科院的地位。

四、學部和學部委員在中國科學院體制中的位置

(一) 蘇聯顧問柯夫達力主建立院士制度

學部委員制是向院士制過渡的一種制度。主要是由於擔心如果仿效蘇聯科學院以院士大會爲全院最高決策機構可能削弱中國共產黨對科學院的領導權，中國科學院沒有採用蘇聯科學院的院士制。⁹²但在選聘學部委員期間，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蘇聯顧問柯夫達力主建立院士制度。B. A. 柯夫達是著名的土壤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他於1954年10月13日抵達北京就職，隨即考察了中國科學院京區、華東、華南各研究所。1954年1月，柯夫達在調查的基礎上向中國科學院院長和黨組提交了一份題爲《關於規劃和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性的科學研究工作的一些辦法》的報告。⁹³在這個報告中，他提出了規劃科學研究工作、建立與發展某些重要學科、科研機構的合理佈局、加強科學院與高校、產業部門的合作，以及設立學位學銜等十一

91 〈學部成立大會工作總結報告〉，見《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頁51。

92 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頁147。

93 《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年》，頁55-63。

項建議，其最後一條就是建立院士制度和學位制度。他認為，「在中國科學院還沒有院士之前，是不能稱其為科學院的，而只是各個研究所的聯合行政組織」。他說，中國已經有一些世界知名的研究工作者，可以授予他們以院士或通訊院士的稱號。他建議在學部委員聘任之後，由政府從「進步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批准第一批 35-40 名院士和 70-80 名通訊院士。他認為，科學院的領導不下研究所，是行政領導科學、管理科學，院士制度不建立，就不能充分發揮科學家的作用。為此，他多次向科學院領導當局提出這個問題。

那個年代，蘇聯顧問的建議就是金科玉律。中國科學院立即著手科學規劃工作，而建立院士制度卻使中國科學院黨組感到為難。他們就是不願意照搬蘇聯的院士制，才提出一套學部委員制度。院黨組沒有把柯夫達的報告立即轉給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而是先在幾次黨組會議上就此進行了分析研究。1955 年 1 月 27 日，院黨組會議經過反覆討論後認為：「(1)如按『寧缺勿濫』的原則，完全根據學術標準任命，對於許多資歷很老而學術上沒有成就的人就不能照顧，尤其在社會科學方面勢必把一些舊的哲學家(如馮友蘭等)、經濟學家(如馬寅初等)拋掉。這樣做是不利於團結科學家和不利於當前的工作的。(2)如把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承認下來(現在美國、臺灣等地的除外)，再增加一批新的院士，在確定人選標準上有困難，如選擇不當，就會引起新的糾紛，這樣做也是不利於團結科學家和不利於當前的工作的。同時，既任命學部委員又任命院士而院士又高於學部委員，將會造成工作中的許多麻煩和困難。因此，大家一致認為應暫緩任命院士，目前應以學部聯席會議和院務會議為過渡時期的形式。經過兩三年的準備工作之後，再過渡到實行院士制度。如中央贊同柯夫達同志的建議，決定任命一批院士，則在今年第一季度只成立學部不召開學部聯席會

議和產生院的領導機關。會議決定把黨組的建議向中央反映，供中央在考慮此問題時作為參考」。⁹⁴

對於中科院黨組的拖延，柯夫達相當不滿。1955年3月7日至1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檢討和總結黨組工作，陳毅、柯夫達、郭沫若等出席，與會者對院黨組和張稼夫個人都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柯夫達批評黨組工作緩慢，不尊重中國科學家。黨內也有人批評院黨組不尊重科學家：「副院長竺可楨、吳有訓在院務會議上發言都謹慎小心，察言觀色，看稼夫同志的眼色。嚴濟慈說：『院務會議是形式，只是通過一下而已』」。⁹⁵ 郭沫若院長在建立院士制度的問題上與柯夫達的看法一致。他在會上提出：希望中央把學術稱號和學位制及早確定下來，特別是任命院士問題，不要再拖下去了。他建議「把國民黨一九四八年選的一批院士全部包下來，再增加一批新的院士」。柯夫達和郭沫若的意見使陳毅不能不對此表態，他在總結發言時表示：「關於院士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柯夫達同志和郭院長的意見。這個問題不能怪科學院黨組，我以前也主張暫緩實行。這次會議把我說服了，還是及早實行好，現在我可以完全站在你們這一邊向中央建議，以後對這個問題再作詳細研究。」⁹⁶

1955年4月，中國科學院黨組專門就建立院士制度問題向中共中央提出報告，建議經過幾年準備後建立院士制。1955年6月2日，在學部成立大會上，郭沫若院長在報告中指出：「科學院是科學家的組織。發揚科學民主最好的形式就是院士制度，即以院士大會為科學

94 中國科學院黨組1955年1月27日會議紀要，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95 《黨總支辦公室田夫同志向院黨組彙報檢查工作進行的情況》，1955年2月，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96 中國科學院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紀要，1955年3月，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院的最高機關的制度。我們也將和有關部門草擬關於院士制度的法律，經過批准後，我們將遴選我國最優秀的科學家作為第一批院士，呈請政府任命。……院士制度建立後，中國科學院將召開第一次院士大會，通過選舉建立科學院的領導機構。院士大會的召開，將使科學院在現有基礎上更進一步民主化，從而更好的領導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⁹⁷

(二) 學部成立大會期間的體制爭議

郭沫若的講話，明確說明中國科學院將採用蘇聯科學院的體制，即以院士為核心，院士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可是，既然學部委員基本上包括了「我國各主要科學部門有代表性的優秀科學家」，⁹⁸ 將來的院士主要從他們中產生，那麼學部委員的職權如何，為學部成立大會的與會者十分關注。這次會議期間，有學部委員提出：「學部~~即~~有 233 專家，應為最高權力機關，為何組織章程草案第十條院務委員會最高權力機關許 [多] 統是行政人員，而院務常務委員會中行政人員的成分更大」。⁹⁹ 為此，當天又請陳毅副總理進行解釋。陳毅說：

「有些朋友有懷疑，認為院務常務委員會中包括人事局局長、辦公廳主任……，許多人不是科學家，外行來領導內行。意見是很好的，院務常務委員會不要見怪，要虛心，是有這個問題。柯夫達顧問也反映了相似的意見，由 233 位學部委員組成的學部大會應成為全院的最高領導機構，我們科學家也有這個

97 《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頁 9。

98 《中國科學院年報·1955》，頁 2。

99 參見竺可楨 1955 年 6 月 11 日日記，《竺可楨全集》第 14 卷，頁 109。

意見。這個問題要澄清一下。院長掌握方針、政策。幾位副院長，還有秘書長、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局長作為院長助手，處理日常領導和日常工作。他們成為領導中心不符合眾望，能不能擔任全國領導？黨中央、國務院考慮認為是可以的。嚴格科學地說，有時外行反而能領導內行。郭院長和幾位副院長在某幾個學術部門上是可以領導的，密切與國務院聯繫，從發展科學出發，領導大家來做。我們中共中央、國務院在自然科學上不懂，社會科學上有些部門也無發言權。……要想找一位院長、幾位副院長，七十二行行行都精通，是不可能的，只有找上帝，上帝又不在人間。院長副院長等組成院務常務委員會可以成為領導中心，但是是不夠的，得要依靠很大一批力量，就是靠學部的 233 位。不能決定的問題請教學部常委，再不能解決就請 233 位都來。集體領導就能成聖人。還可以請蘇聯專家來幫助。這就可以解決主要問題，決定方針、政策、計畫、制度。至於具體的學術問題、專門的研究，就可以不發表意見，依靠專家。……院務常務委員會一定是科學的領導中心，不承認這點就寸步難移。會議的組成人員大家可以提意見，可以討論，但它必須是領導機構。將來設立院士、副院士制度後，院士大會是最高的權力機構，由它選舉院長副院長，但是在院士大會散會後，還是要支持院長、副院長。我們的革命是從下面先來的，先搞地方，一九四九年才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們科學院現在也是先搞學部，再過渡到院士制度，選舉院長，從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也有一個辦法是先搞一批院士，選舉院長，再搞學部，由上而下。這樣最不得人心。

我們現在是先搞思想改造，再搞學部，然後到院士制度。¹⁰⁰

陳毅講話的中心意思是不同意以學部委員為核心建立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認為時機不成熟，學部委員還不能擔負這樣的任務，但他同意院務常務會議的組成「可以提意見」。問題的關鍵是如果以院士或學部委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如何落實中國共產黨對中科院的領導？實際上，在學部建立的同時，院黨組也在加強院內黨的領導。1955年1月，張稼夫就致函中宣部和中組部，請求30位地委級以上幹部擔任黨員副所長、28位縣以上幹部擔任各所辦公室主任。¹⁰¹1955年3月院黨組擴大會以後，院黨組根據學部即將建立的新形勢，調整黨組成員分工，建立了黨組對學部的分工領導，決定潘梓年分工聯繫社會科學部，陳康白聯繫技術科學部，武衡聯繫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和生物學地學部，¹⁰²以確保黨對學部的領導。但如果實行學部大會為最高領導機構，院黨組成員勢單力薄，必然難以控制，黨的政策措施就難以在學部乃至整個中科院貫徹，這是中共領導人所不願意的，當然也是張稼夫不能放棄的。學部委員們提出的學習蘇聯體制問題，就以稍緩建立院士制度而擱置了。

陳毅的解釋雖然差強人意，但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中國科學院的最高官員，在這種場合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因此暫時平息了爭論。但事後，院務常務會議人員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只是對院部機構進行了改組，將院辦公廳秘書處併入學術秘書處，辦公廳

100 陳毅副總理 1955年6月11日在學部聯繫會議上的講話，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101 王中俊，《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頁4-5。

102 中國科學院黨組會議紀要，1955年2月22日，存中國科學院文書檔案處。

其他部門成立管理局。這就大大加強了學術秘書處作為院務常務會議助手的職權，但學部的職權仍然定位於分工領導各研究所。

6月28日，院務常委會議通過《中國科學院學部暫行組織規程》。按照該規程，學部是分工進行學術領導的重要機構，各學部的主要任務，不但要「瞭解與本學部有關的各門科學技術的全面情況和發展趨勢，研究並解決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上的各項學術問題」，指導所屬研究機構制訂「年度計畫、五年計劃和遠景計畫」，以及學科發展計畫等，還要負責檢查和評價所屬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人才培養、職稱升級和獎勵考核等事務。各學部的經常性工作由學部常務委員會領導，常委會設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務委員若干人，學術秘書（非學部委員）1人。各學部另設辦公室，由學術秘書領導。如此雖然賦予學部有較大的職權，但對學部委員的權利，則沒有明確解釋。

（三）學部成立之後中科院領導體制的變化

自中國科學院成立以來，原有的院士不被承認，評議會被撤銷了，各專門委員會也不起作用，專家在院領導體制中的作用迅速被剝奪，中國科學院實行的是單一的黨政領導體制。學部建立後，從體制上保證了專家學者參與中科院的領導，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學部的成立，確有加強了學術領導的作用。從1955年下半年起，各學部負責新研究機構的設置計畫、學術會議的舉辦（如著名的青島遺傳學會議即由生物學地學部籌辦）、審批各研究所的研究計畫，最重要的是著手制訂中國科學院第一個至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發展遠景計畫，並開始評選全國性的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

中國科學院發展遠景計畫包括重大科學問題的研究、學科發展、機構設置、重要的調查和考察工作、重要的科學著作和圖書資料的編

纂、幹部的培養以及基本建設和財務概算等，由各學部分頭進行，從1955年10月開始討論和研究制訂，經過綜合平衡，於1956年3月提出了《中國科學院十二年內需要進行的重大科學研究專案（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部分）》共53項。科學院制訂院遠景規劃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決定制訂國家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並於1956年1月召開知識份子問題會議，提出「向科學進軍」，決定舉國家之力，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特別是原子能、噴氣技術等尖端技術，以實現中國製造原子武器的目的，在國際上爭一席之地。周恩來總理在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指出：「科學是關係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中國必須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準。周恩來提出，爲此要「集中最優秀的科學力量和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到科學研究方面。用極大的力量來加強中國科學院，使它成爲領導全國提高科學水準、培養新生力量的火車頭」。¹⁰³ 同時，他在會議上宣布，中國將制訂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知識份子問題會議期間，1月21日下午，郭沫若院長率領各學部負責人吳有訓、竺可楨、嚴濟慈、潘梓年在中南海懷仁堂向參加知識份子問題會議的中央和國家機關、各省市黨政軍幹部作科學報告，分別報告國內外科學發展狀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陳毅、李富春、鄧小平等親自出席報告會。

中共高層的這一重大決策爲中國科學院的大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1956年3月，國務院設立了以陳毅爲主任的科學規劃委員，作爲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領導科學規劃的常設機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以中國科學院的幾個學部爲基礎，集中全國600多位科學家，按照「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採取「以任務爲經，以學科爲緯，

103 《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年》（中國科學院辦公廳，1958），頁17。

以任務帶學科」的原則，對各部門的規劃進行綜合，當年 8 月完成規劃的編制任務。該規劃確定了 13 個領域的 57 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並從中確定了 12 項研究重點。其中，以科學院作為「主要負責單位」（8 項）和「聯合負責單位」（15 項），占總數的 40.4%；另有中國科學院作為「主要協作單位」參加的 27 項。¹⁰⁴ 隨著規劃的落實，中國科學院的科研機構從 1955 年的 44 個，很快發展到 1956 年的 66 個。¹⁰⁵

在十二年規劃的制訂和實施過程中，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層和院部機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56 年 2 月，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稼夫在規劃制訂過程中由於任務繁重、操勞過度，因健康原因提出辭職。¹⁰⁶ 當年 3 月，張勁夫接替張稼夫，5 月張勁夫等獲任命。與張勁夫一道任命還有院秘書長、院黨組副書記裴麗生和副秘書長、黨組成員杜潤生。張勁夫是主管科學院的陳毅副總理的部下，當時是地方工業部的黨組書記、副部長。裴麗生肄業清華大學，當時是山西省的省長。杜潤生曾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由於在農業問題上與毛澤東有分歧，在 1955 年 10 月遭到毛澤東的點名批評後去職，張勁夫親自登門把他請到科學院，主持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的制訂工作。與張勁夫等一同任命的還有秦力生、謝鑫鶴、郁文、潘梓年、尹達等黨組成員。

學部成立後，院部機構隨之在 1956 年 1 月進行了調整。辦公廳學術行政工作部分與原秘書處合併成學術秘書處之後，原辦公廳撤銷，院部其他部門也有所加強。張稼夫離院之前，向中共中央建議：「為

104 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頁 67。

105 中國科學院計畫局編，《中國科學院四十年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頁 8。

106 張稼夫，《庚申憶逝》，頁 136—137；龐真，《張稼夫》，載余志華主編，《中國科學院早期領導人物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 94—96。

適應今後科學發展的需要，目前科學院院部的領導機構必須加強。首先建議把現在的學術秘書處擴大為統一管理一切日常工作的強有力的工作機構，原來學術秘書處的工作任務可成為秘書長領導下的一部分工作。在秘書長下還可以增設若干副秘書長，分工管理各個主要方面的工作，如學術、行政、出版、對外聯絡等等。」¹⁰⁷ 這是試圖使學術行政一體化，以減少中間環節。張勁夫來院後不久，就於 1956 年 7 月撤銷了學術秘書處，原學術秘書處的學術秘書分別參加有關學部的工作，並恢復辦公廳、計畫局。張勁夫的調整雖然撤銷了學術秘書處，但在加強秘書長的職權方面，他沿用了張稼夫的思路。¹⁰⁸ 1956 年 7 月 28 日，他通過院務常務會議提請任命錢三強、秦力生、謝鑫鶴、陳康白、武衡、郁文任副秘書長，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一任命。這樣，加上裴麗生和杜潤生，中國科學院正副秘書長共有八位。至此，仿效蘇聯科學院而建立起來的學術秘書處，轉變為以行政領導為主要職責的正副秘書長制。學術領導不斷沒有得到加強，反而是進一步加強了院內的黨政領導權。7 月 28 日的院務會議還決定將生物學地學部分為生物學部和地質地理學部，並將物理學數學化學部改名為數學物理學化學部。與此同時，院黨組對學部的分工領導進一步加強。秘書長制建立起來後，黨組決定潘梓年、尹達負責聯繫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杜潤生負責聯繫數學物理化學部等，秦力生負責聯繫地學部等，陳康白負責聯繫生物學部，武衡負責聯繫技術科學部

107 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央的報告，1956 年 3 月 9 日。

108 據裴麗生晚年回憶，「科學院的院長、副院長，基本上由科學家擔任，同時，成立一支秘書長隊伍，做具體組織工作」，是陳毅的意見，見裴麗生，〈傾力「兩彈一星」，壯我國威軍威〉，科學時報社編，《請歷史記住他們》（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頁 74–75。由此可知，張稼夫的建議得到陳毅的認同。

等，雖然他們對於分管的各學部的職責是「幫助院長、副院長進行工作，和學部正副主任多聯繫商量」，但由於黨組擁有最高權利，實際上這一分工領導制必然削弱了副院長、學部主任等專家的權力。正副秘書長的實際領導權在副院長和學部之上，成為院長和黨組書記之下握有實權的新的行政領導層。

與此同時，所級黨組織也不斷得到了加強。1956至1957年兩年間，先後有40多名司、局級黨員領導幹部被調到中國科學院任職。他們到院後，都被授以要職，委以重任，成為院部和一些重要研究所的主要領導人。由於黨政權力的加強，新建立的學部和各所學術委員會的職權都難以落實。

總之，1956年體制調整之後，中國科學院形成了黨組、院長副院長、正副秘書長為第一層次，學部與人事局、國際聯絡局等職能局為第二層次，各研究所為第三層次的組織領導體制。這一體制，既不同於蘇聯科學院，也不同於中央研究院，可以說是中國科學院的創造。其中，掌握實權的是黨組書記、黨組成員包括正副秘書長，陶孟和、竺可楨、吳有訓等專家副院長雖僅名列院長之後，但實際權力則遠遜之。副院長尚且如此，學部委員和學部的學術領導權之難以落實，自不難理解。這是黨領導體制下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科學院體制上的一大難題。

(四) 第二次學部大會與體制爭議再起

按照中科院學部有關規定，學部大會每年舉行二次，由於學部委員上半年投入科學規劃的制定，下半年耗時於第一次科學獎金的評選，年末又開始增補學部委員的工作，因此1956年應該召開的兩次

大會，應大多數委員的要求，經院務常務會議通過，都被取消。¹⁰⁹直到 1956 年初，獎金評選工作結束，中科院才決定在 1957 年上半年召開第二次學部大會。

第一次科學獎金的評選，主要由學部實施。先由各學部常委會分學科進行評選，匯總後由中國科學院獎金委員會投票通過，最後經院務常務會議通過。在評選過程中，黨政兩方面的直接干預很少。但在院務常務會議通過獲獎名單之後，接替陳毅主管科學工作的副總理聶榮臻認為，未評選中國科學家在國外的科學成果不利於爭取海外學者歸國，是一個嚴重的缺陷。隨後，各學部常委會就此進行了補評，並經獎金委員會審核通過，結果將錢學森、黃昆等補入獲獎名單。¹¹⁰這次干預是從彌補評獎活動的不足出發，最後也是由學部評選。

學部委員的增補工作是在院黨組和中宣部討論制訂了增補原則，並經聶榮臻同意後開展的。增補原則是「增補從嚴，寧缺勿濫；補漏不求全；主要從學術水準考慮，不要著重從照顧學科、地區、部門考慮」，主要考慮增補三方面的人物，一是「新回國的優秀科學家」，一是「近幾年有突出成就的科學家」，一是「原來學術水準較高而上次未列的老科學家」。1957 年 1 月，各學部根據上述原則精神，反覆與在京學部委員醞釀磋商，並書面徵求京外學部委員意見，數理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及技術學部並在常委討論時採取無記名投票的「民意測驗」，初步提出了 37 位增補委員名單。隨後，院黨組徵求各有關部門黨員負責人意見，又經向中宣部彙報請示，並經過院長、副院

109 郭沫若，〈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幕詞〉，《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中國科學院辦公廳，1958），頁 103。

110 參看：郭金海，〈中國科學院科學獎勵制度的建立與首次科學獎金的評獎〉，《科學文化評論》第 5 卷（2008）第 4 期，頁 17–40。

長、學部主任幾次討論，對各學部提出的 37 位名單，本著寧缺勿濫的原則，提出減少增補人數。¹¹¹ 至 5 月 22 日，第二次學部大會前夕，經各學部投票，增補了 21 名學部委員。¹¹² 這次學部委員的增補，淡化了政治標準，提出做科學行政工作的黨員學部委員「應在適當時機提出辭職」，並提出「今後擬考慮進一步改由科學界民主選舉產生」，可視為向院士制度過渡的措施。

學部成立後，學部在中科院體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隨著院部其他黨政管理機構的加強，理順學部與院部其他機構的關係，給予學部以適當的定位，以及如何通過學部進行學術領導，都是擺在中科院領導和學部面前的問題。為此，中科院黨組、院務常務會議從 1955 年到 1957 年反右之前，對學部工作進行了幾次會商，但始終沒有取得結論性的意見。由於學部的性質不能確定，院士制度何時建立也沒有明確，因此，與 1955 年學部建立同時開始進行的具有中國科學院組織法性質的「院章程」的草擬和頒佈，也一拖再拖。

對於這種局面，不少學部委員都表示不滿。尤其 1957 年 5 月 23 日至 30 日中國科學院全體學部委員第二次大會期間，正處於反右運動前的「大鳴大放」階段，有的學部委員對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發表了批評意見。如湯佩松在生物學部的會議上說：

首先應明確現在所提的中國科學院指的是誰？一般的理解是天津街 3 號（即中科院院部機關——引者）。但實際上中國科學院的「中國」二字已經沒有了，因為沒有領導全國，不能成為

111 《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增補學部委員的報告》，1957 年 5 月 3 日。《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1957 年》，頁 79-81。

112 《竺可楨全集》第 14 冊，頁 580。

全中國的科學院。而科學院也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人在專門搞「科學」，而另一部分人則在「辦院」。辦院的人辛辛苦苦，關著門搞，搞得機構重迭，形成了牆。這些人在領導誰呢？不僅不能領導全國，恐怕院內各所也未領導好。至於各所是否能夠領導全國，需要視各所的學術水準而定。另一種領導需要拿出工作，來讓人家看齊，而不是發號司令。這種領導不在文津街3號，而在這兒——全體學部委員。我希望有人在大會發言時提醒一下文津街3號的先生們，領導全國的科學院不在文津街，而在北京飯店——學部大會。

領導科學不要做行政領導，而是要每年召開一次學部委員會，由院長做一個報告，向全國人民指出全世界的科學水準，我國的科學水準和急需要發展的學科，這就是中國科學院的任務。做過這個報告的院長，應當是由大家舉出的，真正做研究工作的人，而不是空喊口號的人。……對於經費的分配，是平均還是重點分配？重點放在哪兒？比例是誰定的？怎樣定的？在定這個比例時，能否和我們談談？

我反對領導上已有決定再要科學家討論的工作方法。

科學院最大的缺點是全部人馬配備齊全，把科學機構辦成了衙門。……科學院應當成為一個科學家的民間組織，民營合助，院長由科學家們所選舉的能代表大家的人來做。行政人員是由科學家們請來幫助工作的。

金屬學家李薰則說：

科學院是外行領導內行，任務與能力矛盾。科學院黨有宗派主義，為了加強領導，就加人，但量不能勝質。秘書長有很多

個，做太上局長。官僚主義，忙於開會，不做實際工作。科學院黨政不分，黨內商量好，黨外來執行，干涉所長權力。科學院成立學部，抄蘇聯，未真正解決問題。院領導不懂科學生根的重要性。中國科學院四不像，既不領導院內，又不面向全國。學部委員中，有些老人，不起作用，可以讓他們退休，別占了位置。

副研究員楊紀珂在技術學部會議上說：

做官的人以為科學的發展必須在會議中產生。我們認為必須在實驗室中做。現在官風壓到了學風。……秘書長很多是黨員，各所還有副所長，把科學家像牛一樣牽了鼻子走，用意是幫助科學家，到底幫助沒有？我不知道。¹¹³

地學部學術秘書施雅風說：目前學部的處境，形式上很莊嚴，實際是無錢無權。委員們開會就散了，學部又沒有權力，工作很難做，問題很嚴重。盛彤笙認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可以取消，把規劃工作交給科學院。戴松恩認為學部不應掛在院務會議之下，學部委員會應當與院務會議平衡，院務會議分管行政工作，學部委員會分管學術領導工作。¹¹⁴會議期間，不少學部委員提出了改進學部學術領導的建議。但類似的建議在院黨組會議上都多次討論過，沒有得出結論。在中科院的組織體制沒有變動的前提下，學部定位不能明確，因此一

113 以上言論，均見《對第二次學部委員會情況簡報及個別委員的發言摘錄》，1957年5月。

114 以上意見均見《科學院學部大會繼續舉行分學部會議 對於學術領導問題看法不一》，《光明日報》1957年5月26日。轉引自《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7年》，頁154-156。

切問題都難以解決。這次會議上通過的《學部暫行組織章程》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變化。

這些意見集中反映了專家與黨政幹部之間的衝突。在張稼夫、張勁夫等領導者聽來也許會覺得委屈。郁文，副秘書長之一，他在回憶1953年到科學院工作時，張稼夫給他四條教言：「一、要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愛護科學家，為科學研究工作創造有利條件。二、科學無止境，科學家是能人，自己不懂的事不要裝懂，無把握的事不要瞎指揮。三、在科學院做黨的工作，切忌『以黨代政』『黨政不分』，要注意多聽取科學家的意見。四、做到謙遜、誠懇待人，能關心人、幫助人才能團結人」，他一直牢記在心。¹¹⁵張勁夫回顧他在中國科學院期間的工作時說：「我剛到中國科學院時，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瞭解比較少，許多人和事都不熟悉。記得當時鄧小平同志和我談話時說：在科學院工作，黨的領導幹部要和科學家交朋友，關心、幫助他們。就是要老老實實當好勤務員，為科學家服務，替他們解決困難。我就是按照這些指示去努力做好工作的。我在科學院實際工作十年，可以說也是向科學家學習的十年，為科學家服務的十年。」¹¹⁶雖然他們主觀上都有為專家服務之心，但在現實中，他們擔負著領導之職。共產黨的政策要通過他們來體現，他們的職權也高居學部委員之上。這種體制上的根本矛盾，難以通過個人的努力得到化解。

第二次學部大會之後僅隔數天，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就開始了，湯佩松等人的言論迅即遭到批判，盛彤笙則被劃為「右派」。雖然鑒於中國優秀的科學家太少，張勁夫提出要在反右運動中保護科學

115 郁文，〈深切懷念張稼夫同志〉，《院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1期，頁9。

116 《張勁夫文選》（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頁290。

家，湯佩松和李薰都避免了被劃成「右派」的厄運，但隨著知識份子被劃入必須改造的物件，學部委員的學術領導權也就微乎其微了。1958年「大躍進」運動緊接「反右」而來，其間又發生了批判資產階級科學路線和「拔白旗、插紅旗」等運動，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學家被剝奪了學部委員的稱號，更多的學部委員受到衝擊，1957年新增選的學部委員湯飛凡不堪侮辱而自殺。在這種形勢下，學部委員的榮譽性也喪失了。從此，學部委員的學術領導權被剝奪殆盡。但學部作為院部學術領導機構保留了下來，且各學部辦公機構逐步加強，成為院部分工聯繫和領導各研究所的常設機構。¹¹⁷而哲學社會科學部則於1957年8月起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其後逐步與中國科學院脫離領導關係，成為掛在中國科學院名下而實際上不屬於科學院領導的特殊機構。¹¹⁸1967年1月，學部被作為所謂的「修正主義科研路線」、「專家路線」的產物，被徹底砸爛，許多學部委員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批鬥，不少人慘遭迫害致死，學部委員的稱號也沒有了。

五、結語

學部委員不同於院士。主持制訂學部制度的張稼夫說：「我們搞學部，實際上是從中國當時的實際出發，是發揮黨領導科學的作用。」¹¹⁹這實際是說，建立學部和遴選學部委員乃是利用專家幫助外

117 參見：薛攀皋，〈不曾想走的路：我與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史雜誌》，第29卷第4期（2008），頁312-317。

118 1977年，該部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

119 〈張稼夫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1年第6期，頁27。

行的黨領導內行。但無論是專家還是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都從學術榮譽和學術權力出發看待學部委員這個頭銜，認為學部委員首先意味著很高的學術榮譽，視之為改了名稱的「院士」。對於一些以學術為志向的學者，在獲得這種榮譽之後，就不願意把時間和精力用於學部的事務性工作。學部成立大會期間，蘇步青、趙忠堯、彭桓武等人都反映根據學部暫行規則感到任務很繁重，有畏難情緒。趙忠堯很怕事務工作，他說，學部委員和常委應該是人民代表一樣，只提意見不做具體事。生物學部副主任童第周表示最好不擔任學部副主任，他說自己最多還可以搞十年研究工作，以後就不行了。¹²⁰ 這表明，科學共同體的一般規則，仍然制約著中國科學院的思維和行爲。

而這種榮譽對於那些學術不高的學部委員也構成一種壓力。如北京植物所副所長吳征鎰主要是以黨員資格獲聘學部委員的，1958年，他決定舉家遷居昆明。他回憶說：「（當時）我已年逾不惑，亟思尋一安身立命的場所有所創樹，才對得起『學部委員』頭銜。……我遂毅然請示調往雲南昆明，與蔡希陶合作建一新所，在植物學研究上了我夙願。得科學院黨政領導首肯，乃正式調往當時新設立的由劉希玲領導的雲南分院……」¹²¹ 後來吳征鎰參加並在後期主持《中國植物志》的編纂，在植物學上多有成就，於2008年初獲得國家最高科學獎。不過，如吳征鎰那樣以黨員幹部身分獲聘為學部委員者，並有志於在

120 《學部成立大會情況簡報》第3、4期。

121 吳征鎰，〈九十自述〉，見吳氏《百兼雜感隨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48。1956年7月1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就前一年錯誤批判胡先驥親自登門向胡先驥道歉時，胡先驥認為北京植物所「領導不強，錢老[錢崇澍]年老；吳征鎰雖努力，但事雜不能高瞻遠矚，逢事對付。」見胡宗剛撰，《胡先驥先生年譜長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頁584。

學術上發展且有成就者並無第二例，他們大多數學術基礎不足，也不可能擺脫黨政事務，與學術界出身的學部委員不同，他們傾向於強調學部委員的領導性質。

這樣，從張稼夫到張勁夫等黨政領導一直面臨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方面要減少學部委員的行政事務，另一方面卻要落實他們的學術領導權。而減少學部和學部委員的行政事務，勢必加強院部黨政機關，進而又影響到學部委員的學術領導權。從學部建立開始，這兩方面的衝突就一直存在著，成為中國科學院體制上的一個基本問題。直到反右以後，以政治領導壓倒學部委員而告一段落。

但即使反右過後，那些處於領導職位的科學界元老仍然保持著他們的位置，儘管他們的實際權力不大。以當年「又紅又專」的標準看來，他們政治上不「紅」，專業上過時了，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稱不上「專」。他們的領導地位說到底不過是「統戰」而已，朝不保夕。因此，對於黨政兩方面的政策和要求，他們都只能隨聲附和。這不獨中科院為然，高校和其他部門的學部委員大率如此。耐人尋味的是，中國科學界的這些元老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他們中的一些人如周培源、嚴濟慈等度過了「文革」等劫難，在1970年代末重新獲得在科學界的領導地位。到1980年代初，當絕大多數黨政幹部退出了中國科學院乃至中國科學界的領導層的時候，華羅庚、李薰等當年的批評者也出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重要職位，與那些老一輩的倖存者分享中國科學界的領導權。1981年以後，專職黨員院領導逐步退出中國科學院的領導核心，開始了科技專家治院的時代。1981年，全體學部委員大會成為中國科學院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是當年很多學部委員追求的目標，也實現了。這一時期還實行從學部委員間接選舉院長的新的領導體制，此時的中國科學院，在體制上與中研院或蘇聯科學

院較為接近。然而，新的體制似曇花一現。出人意料的是，1984年中國科學院第五次學部委員大會時，學部委員主動放棄了這些權利。至此，學部委員大會成為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學部委員則是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榮譽稱號，而學部原有的評議職權則近乎完全取消，從此中國科學院實行院長負責制，在研究所則實行所長負責制。1994年，全體學部委員轉為院士稱號，完成了從學部委員制度向榮譽性院士制的最後轉變，¹²²但這並沒有繼承中研院或歐洲一些有研究實體的國家科學院的學術自主體制。1987年7月，各學部的辦事機構轉變為數理化學局、生物科學與技術局、技術科學與開發局和資源環境科學局共四個專業局，各局局長也由來自研究所的專家出任。但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院士大會定位於諮詢機構，沒有決策權，沒有選舉院長、副院長的權力，分工領導各研究所的權力也轉給了各專業局。這個格局，一直延續至今，而官本位的問題益發加劇，院士群體的學術弊案也屢見不鮮。這一類問題，就不單是黨領導體制的原由了。這表明從黨政領導過渡到專家領導後，並不必然能夠建立學術自主的中國科學院領導體制。

總而言之，從中央研究院到中國科學院的建立，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科學事業的領導，學部的建立和學部委員的選聘，是對黨領導體制的補充，因此學部委員與院士的理念不同，標準也不一樣。在這一體制下，中國科學院在短時期內得到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聚集人力物力，建立起大批新研究機構，開拓一批新的學科領域，為中國科學技術事業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迅速發展打下了基礎。在這

122 王揚宗，〈中國院士制度的建立與問題〉，《科學文化評論》第2卷（2005）第6期，頁12。

個過程中，學部和學部委員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在貫徹黨和國家意志的同時，損害了學術自由和科學界的獨立性，從而深層制約著科學的發展，致使中國科學院的學術體制至今仍不健全。當今的中國科學院，學術體制上的歷史問題仍是現實的問題，擺脫意識形態至上的舊思維，重新界定黨和國家與學術的界限，推進學術民主和學術自主，乃是理順學術體制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國科學和學術興旺發達的必要前提。